



# 東方考古研究通訊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第一期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  
Oriental Archae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 《东方考古研究通讯》编辑委员会

白云翔 陈星灿 方辉 宫本一夫 栾丰实  
佟佩华 王青 文德安 赵辉

主 编：方 辉

封面设计：韩小囡

本期编辑：陈淑卿 王 芬 卢建英

主办单位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编：250100

E-mail: [arc@sdu.edu.cn](mailto:arc@sdu.edu.cn)

网址: [www.arc.sdu.edu.cn](http://www.arc.sdu.edu.cn)

电话：0531—8366149/8565268

传真：0531—8565268

# 目 录

## 中心动态: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介绍·····(1)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章程·····(2)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组成人员·····(4)

## 学术研究: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6)
- 苏秉琦晚年的学术研究主线·····朱乃诚(8)
- 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邵望平(9)
- 论中国史前城址平面布局的若干特点·····林留根(11)
- 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浅析·····王 巍(13)
- 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镶嵌铜牌饰·····王 青(14)
- 山东半岛旧石器晚期石器工艺技术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沈 辰(15)
- 淮系文化新说·····高广仁(16)
- 我国东方新石器时代中前期诸文化因素异同之辨正·····徐 基(18)
- 海岱文明的再思考·····张学海(19)
- 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栾丰实(20)
- 山东史前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佟佩华(23)
- 从陵阳河与大朱村发现陶尊文字谈起·····王树明(25)
- 大汶口遗址的随葬石器·····岩崎厚志(26)
- 龙山时代中原与海岱地区文化分布格局的比较·····赵春青(27)
- 商代海岱地区之考古文化——再论岳石文化的消亡过程·····黄川田修(28)
- 关于辽西区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思考·····郭大顺(29)
- 长江下游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宋 建(31)
- 长江下游史前聚落的量化分析·····高蒙河(33)
- 关于环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思考·····张 敏(34)
- 关于良渚遗址群的若干问题·····杨 楠(35)
- 登封八方王城岗遗址的聚落形态考察·····方燕明(36)
- 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过程·····德留大辅(38)

东北亚农耕的扩散与山东半岛·····	宫本一夫 (39)
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张居中等 (40)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食品工具·····	加藤里美 (41)
两城镇遗址水稻植硅体初步研究·····	靳桂云等 (43)

地质考古学研究与复杂社会观念：青海省个案研究·····	王 睦 (45)
中国古代早期制盐业的初步研究·····	朱继平等 (47)
青铜器重熔对铅同位素比值的影响·····	李清临等 (48)

**田野简讯：**

2003 年长清月庄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王建华 (49)
2003 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方 辉 (51)

# Contents

Introduction to the Research Cen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1)
Regulations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2)
Members of the Research Cen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4)
Summar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Societies in Eastern China.....	
Complex Societies in Eastern China.....	(6)
The Thoughts of Su Bingqi's Academic Research in His Later Years.....	Zhu Naicheng (8)
The Role of Ritual System in Formation of the Complex Socie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	Shao Wangping (9)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rehistoric Town.....	Lin Liugen(11)
A Study on the Reason of Cultural Changes in East China around 2000B.C. ....	Wang Wei (13)
The Bronze Inlaid-turquoise Plaques in the Process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	Wang Qing (14)
Lithic Technological Variability of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Shandong Peninsula.....	
in Shandong Peninsula.....	Chen Shen (15)
New Ideas on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Huai River Valley.....	Gao Guangren (16)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Cultural Factor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Eearly and Middle Neolithic Age of Eastern China.....	Xu Ji (18)
Rethinking on the Haidai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Zhang Xuehai (19)
On the Process of Prehistoric Society Complexity in the Haidai Region.....	Luan Fengshi (20)
A Study on Shandong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ong Peihua (23)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Zun Vases Unearthed from Lingyanghe and Dazhucun Sites, Dawenkou Culture .....	Wang Shuming (25)
The Relation of Dawenkou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	岩崎厚志 (26)
The Contrast of Culture Distribution between Haidai District and Center District in Longshan Period.....	Zhao Chunqing (27)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Shang Dynasty in Haidai Region — Re-discussion on the Vanishing Process of Yueshi Culture.....	黄川田修 (28)
Research in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s in Liaoxi District.....	
in Liaoxi District.....	Guo Dashun (29)
The Importance of Eastern Area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ss .....	Song Jian (31)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Valley.....	Gao Menghe (33)
On Primitive Culture in the Taihu Region.....	Zhang Min (34)
Several Issues on the Liangzhu Clusters of Site, Liangzhu Culture .....	Yang Nan (35)

Inspection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Wangchenggang Site in Dengfeng City, Henan Province .....	Fang Yanming (36)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Wangwan III Culture, Longshan Period.....	德留大辅 (38)
The Confusion of Land Reclamation and Cultiv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Shandong Peninsula.....	宫本一夫 (39)
A Sketch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historic Rice-agri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in the Huai River Valley .....	Zhang Juzhong (40)
The Food-processing Tools Unearthed from the Haidai Region Sites, Neolithic Age.....	加藤里美 (41)
Phytolith Evidence for Rice Cultivation at Liangchengzhen Site, Eastern China.....	Jin guiyun (43)
Geo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 Concept of Complex Societies:Case Studies in Qinghai Province.....	Mayke Wagner (45)
A Preliminary Study on Early Salt-making Technology in Ancient China.....	Zhu Jiping (47)
The Influence on the Ratio of Lead Isotope from Re-smelting.....	Wang Changsui , Qin Ying ,Li Qinglin (48)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Yuezhuang Site, Changqing, 2003.....	Wang jianhua (49)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Daxinzhuang Site, Jinan, 2003.....	Fang Hui (51)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概况

山东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12月28日。由于机构建设的逐步完善和研究特色的日益凸现，2003年4月20日正式改名为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心是隶属于山东大学并有独立编制的科研机构 and 研究生培养机构，确定编制20人，目前在编人员均拥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栾丰实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由来自北美、欧洲、日本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山东大学考古系的知名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主任由美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加里·费曼（Gary Feinman）教授担任。

百年山大，素以文史见长，作为史学研究主要分支学科的考古学，在我校也有三十余年的历史，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镇之一。多年的教学实践与科学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人文、环境的整合研究，考古专业借助与国际科研机构合作的优势，在史前聚落考古、商周古国研究和汉王陵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成立，既顺应了将新山东大学建成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需要，又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现状和史学发展走向的要求，不仅在学术上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东方考古中心设有史前考古、历史考古与实验室考古三大研究方向，其中实验室考古又下设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石器分析等实验室，重点对中国东方地区及东亚其他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社会经济状况、环境变迁等重大课题进行深入思考，注重个案研究、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预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对一些重大课题取得突破性认识。近期目标之一是以现有科研成果为基础，加强综合研究、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和文明特质的研究，归纳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建立国内外领先的学术地位。其二是在环境考古学研究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并形成自身学术特色。在进行中国古代人地关系的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古代环境演变规律，并全面总结古代治理环境的经验与教训，为当今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可靠的历史依据。

中心将创办《东方考古研究通讯》和大型年刊《东方考古》，前者主要收集并及时向学术界传输东方考古研究的学术动态和科研信息，刊载与此相关的发掘快讯、研究动态、科研信息及相關论文摘要；后者将正式刊出相关的研究报告及学术论著，汇集最新成果，把握学术前沿。同时建设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网站，为国际学术交流与资源共享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与支持。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中国东方地区的考古学人才培养中心、考古学研究中心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其开放性、国际性的人员构成和课题设项，必将对中国东部乃至东亚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校内的学科发展等产生深远影响。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章程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心定名为“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

第二条 中心是以研究中国考古学为主的实体学术机构。

第三条 中心以山东大学考古系的科研队伍为基础，联合校内外、海内外相关学术力量，提倡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方法，进行中国考古学和中外比较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培养高层次的考古专门人才，以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 第二章 机构

第四条 中心设立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是中心在学术上的决策机构，负责研究方向的确定，审议申报省部级和国家重大研究项目，评估研究成果。学术委员会由7名不同年龄段的国内外知名考古学家组成，为保证学术委员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校外（包括国外）委员不少于二分之一。

学术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学术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临时出现重大问题，则采用通讯方式征求各位委员的意见。

学术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换届时更替的委员一般在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左右，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第五条 中心设名誉主任一名。

名誉主任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如无合适人选，可暂时空缺。

中心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主持中心工作。其主要职责是，根据中心宗旨制订中心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向学术委员会汇报中心工作并提交由学术委员会讨论研究的问题。中心下设史前考古、历史考古和环境考古三个研究室。各室设主任一名，负责组织本室研究人员拟定研究课题，检查课题的实施与结项，组织培养研究生工作。

第六条 中心设图书资料管理人员和秘书各一人。

资料员负责图书资料的采购、保管、整理、编目、借阅工作。

秘书负责中心的设备管理及日常文秘工作。

## 第三章 科学研究

第七条 科学研究实行课题制，研究人员采用流动的聘任方式，专职高级研究人员控制在6~9人。

研究课题需经研究室、中心两级论证通过后方可立项，拟向上申请的重大研究项目需经学术委员会审议。

中心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向校内外公开招聘专、兼职研究人员。中青年学者应占一定



比例。未承担中心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而欲进入中心工作，须带研究课题和课题经费。任何研究课题均要有相关的校外学者参加。

课题需按期结题，结题后，课题协议自动解除。个别研究课题未能按期结题，需经学术委员会会议研究批准方可延长。

第八条 中心负责编辑出版本中心的研究成果和大型学术年刊《东方考古》。

年刊实行匿名审稿制，每期发表校外（包括国外）人员的研究论文不少于三分之一。

第十条 每项研究成果必须经过严格评审。

优秀成果给予奖励和表扬，不合要求者给予一定的惩罚和批评。奖惩的具体办法由学术委员会制定。

第十一条 由各室申报，每年派出和接受国外一定数量的访问学者，了解和学习本领域最新科学知识。

#### 第四章 经费

第十二条 经费主要来自学校的拨款和课题经费。积极募集海内外个人和团体的捐款。

经费的使用，按照公开的原则、节约的原则和学校财务制度严格管理。

科研经费的审批，实行主任和课题负责人双签制，其他经费由中心主任和相关室主任联合批准。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学研究中心组成人员

## 学术委员会

主任：加里·费曼（Gary Feinman）

副主任：栾丰实

委员：加里·费曼 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教授

宫本一夫 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

王 睦（Mayke Wagner） 德国考古学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 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佟佩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栾丰实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方 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于海广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 专职研究人员

### 一、史前考古研究室

栾丰实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德安（美）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 二、历史考古研究室

方 辉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任相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崔大庸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 三、环境考古研究室

靳桂云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王 青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赵志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兼职研究人员

沈 辰（加拿大） 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宫本一夫（日） 日本九州大学

许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袁 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郑 岩 山东省博物馆

胡新生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系

于海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陈淑卿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 行政机构

中心主任： 栾丰实

中心副主任： 方 辉

学术秘书： 陈淑卿

#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秘书组

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领域中的重点课题，而由燕辽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太湖文化区组成的中国东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包含信息丰富，在这一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03年10月26日至10月29日，“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并得到了山东大学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会代表9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就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东方地区在中国文明发展和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等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现将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收获简要介绍如下。

##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和国家的产生

邵望平先生从考古发现来讨论礼的本质与其在文明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她认为古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统治者的贪欲，礼制则是对贪欲的制衡与引导力量，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王巍先生指出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以外的其他文化和社会并未沿着原来的发展轨道完成其全过程便中途“夭折”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被纳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王朝为中心，或在其强烈影响下发展的轨道上来。他从地理环境、军事较量、抵御自然灾害的对策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大变革的原因，探讨了华夏集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优势所在。

## 二、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栾丰实先生认为海岱地区的早期文化自成体系，其古代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渐复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 and 结构方面的深刻变化。他从分析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房址、墓葬等的相互关系入手，将海岱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划分为平等社会、由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和分层社会三大阶段。张学海先生也提出史前聚落的存在形态经历了零散分布到成群分布的重大变化，反映了氏族、部落、国家的发展过程，指出中国不存在酋邦时期。高广仁先生对先秦时期的“淮系文化”做了整体分析，提出淮夷文化也是秦汉文明的源头之一。郭大顺先生着重强调大汶口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认为其高度规范化的陶器组合已具礼器性质，说明该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曾起到原动力的作用。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文德安女士介绍了两城镇龙山遗址房屋建筑多样性的意义以及不同时期聚落组织发生变化的原因。另外还有学者对东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交流、海岱地区文明演进的多元视角等问题提出见解。

一些学者还强调了文献典籍在先秦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海岱地区是古代东夷族的聚居地，相当客观的历史文献记载了众多可信的传说。用考古资料印证历史记载，从历史学、社会学和考古学结合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是重要途径之一。

### 三、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宋建先生认为环太湖地区从崧泽—良渚的过渡段开始加速文明化进程，较早达到巅峰。良渚文化为相当复杂的等级社会，上层以宗教的力量掌握不同层面的政治运作权与财富支配权。公元前第三千纪各地区加速文明化进程，东部地区和中原地区比较，社会复杂化处于领先地位，甚至接近稍晚的二里头文化，东部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敏先生从太湖地区邻近的宁镇地区和江淮地区的角度出发，对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进行动态的审视和考察。杨楠先生对良渚遗址群内诸遗址之间的年代关系、空间关系、莫角山遗址的重要遗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

### 四、原始农业以及与文明进程关系

张居中先生对安徽境内淮河中游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遗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淮河流域是史前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两种耕作方式的交错分布带。赵志军先生对比分析了两城镇遗址和教场铺遗址的浮选炭化植物遗存，指出两城镇的农业经济是以稻作生产为主，而教场铺属于典型的以种植粟为特点的北方旱作农业经济。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克劳福德（Crawford）先生介绍了两城镇遗址发掘中所采用的植物遗存收集方法，公布了发现的各类植物遗存。提出稻、粟及小麦的组合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古代农业的发展进程。靳桂云博士通过植硅体分析介绍了两城镇遗址的农业情况，指出该地区龙山文化居民以种植粳稻为主。此外，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先生就东北亚农耕的扩散和传播路线、国学院大学的加藤里美博士对食品加工工具和加工方法等问题做了相应探讨。

### 五、新概念的引入和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

国内外学者还在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一些新的概念引入考古学。德国考古研究所的王睦女士通过“地质考古学”对青海省官亭盆地包括人类社会复杂化进程在内的地理生态系统进行尝试性阐释；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关玉琳女士回顾了海岱地区进行的“景观考古学”的研究，并通过在日照地区进行的区域系统调查成果揭示地形条件对聚落选址的影响。相对于历史地理学这个概念，高蒙河先生提出“考古地理学”，并指出聚落考古研究的基础之一是对遗址群的时空位置变化进行分析。

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渗透和运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朱继平等通过 XRD、SEM 和液相包裹体的测试分析研究，证实了我国古代井盐的开发和利用至少可上溯至西周时期。李清林等重新审核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进一步揭示青铜器重熔和热处理对铅同位素比值的影响。会上还有学者介绍了对石器的专门研究，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沈辰先生从石器工艺技术的角度考察了山东地区的石器工业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另外，与会学者还对近年来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如登封王城岗、郑州商城外郭城、济南大辛庄等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状况作了简要介绍。

会议的最后，栾丰实教授做总结发言，他简要地回顾了文明起源的研究历程，指出近几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正在由建构文化发展谱系向关于人、社会、环境和资源及其整合研究方面转移，由此而来的考古学研究的多样化已是大势所趋。在各个文化区内部选择一些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好、文化和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并与后来历史时期的古代国家具有密切关系的小区域，把微观聚落形态研究和宏观聚落形态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应代表了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研究的主要方向。

# 略谈苏秉琦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主线

## ——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一

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苏秉琦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几乎倾注了他晚年学术生涯的主要精力。然而，苏秉琦先生进行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既不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初衷，也不是他晚年学术研究的唯一目的，而是一直围绕着他晚年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进行的。

### 一、苏秉琦先生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形成

苏秉琦先生晚年的学术论述十分丰富，形成有 80 多篇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学术研究主线。这条学术研究主线最初形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表述，是于 1979 年 4 月 10 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当时他提出，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

### 二、苏秉琦先生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修订

这一在 80 年代初形成的学术研究主线，在苏先生后来的研究实践过程中又作过修订和调整。其中一次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适应研究发展的需要，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纳入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中。如他在 1986 年 8 月 18 日的谈话中指出：

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国统一多民族形成问题、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永远给我们以启迪；从野蛮到文明是社会史问题，又是我国各族人民曾经实实在在经历过的历史问题。这次谈话记录，后来以《中华文明的新曙光》刊发于《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

### 三、苏秉琦先生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调整

苏秉琦先生在 1991 年年初对以往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作了重新思考后，在当年的 9 月 18 日于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又对他的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作了完整的表述。即：

第一、文明起源，换句话说，即“从氏族到国家”；

第二、中华民族最初形成与发展；

第三、中国文化传统的直根系形成与发展等。

这一学术研究主线的内容，后来他概括为两项，即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如他于 1994 年 1 月为“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而作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中指出：国史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起源（即文明起源），二是民族文化传统。

### 四、苏秉琦先生晚年学术研究主线的形成修订调整过程所反映的其学术研究思想的升华过程

苏秉琦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主线是十分明确的。他晚年的学术研究，从初衷到目的，基本上是一而贯之。他晚年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和研究，都是围绕这根主线的内容展开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及不同的学术大背景下，对学术研究主线内容的提法有所区别而已。其中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种种论述，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学术研究目的而进行的种种探索。

# 礼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

邵望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在人种上、文化上绵延五千年而不衰、而不断的独一无二的文明，在先秦时代就已形成了许多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在其后历史长河中，虽不断发生着变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并成为不衰不断的文化传统。这些特征之一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统治秩序是靠礼制而不是宗教来建立的。

何谓礼制？礼制是王权以各种规则、名分（或爵位）、礼仪、礼器等手段对社会各集团，特别是贵族内部各阶层的行为，包括权力、义务的制度化规定。诸如确定管辖范围、限定剥削度和忠君纳贡、出师勤王等。王权为了保护贵族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必须制约贵族个人一己的贪欲；把贵族间的利害斗争限定在“秩序”的范围内，以制衡无度的厮杀。这一论断是基于我对一种历史观的真诚的理解：远古社会经历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从蒙昧到野蛮，从野蛮到文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贪欲，主要是社会上层的贪欲。

众所周知，原始农业的发明，使人类过上定居生活，有了稳定的收获和相应的积累手段，人们在维持活命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之外有了“相对剩余”，因而能以旧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速度改善着衣、食、住、行，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但同时，剩余的积累又刺激起人们的贪欲。最初可能是氏族首领在氏族制度容忍下的“巧取”，导致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私有萌芽，社会开始进入野蛮时代。海岱区所见，后李墓地、大伊山墓地所反映的还是“普遍平等的”贫困；王因、刘林等墓地反映的已是社会分化的低级形态了。当由“巧取”发展到“豪夺”，抢掠财富成为突出时代特征，便达到了野蛮的高级阶段。以大汶口、陵阳河等墓地与建新、南兴埠等墓地相对照，可以看到氏族部落间的优胜劣汰，导致中心聚落的崛起；大汶口、陵阳河等墓地中那些随葬上百件的非实用的贵重奢侈品的富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相对照，又说明社会已贫富悬殊、完全地分裂。富墓中随葬超量奢侈品的目的在于夸富，而夸富就代表了野蛮时代的价值观念。试想，如果没有贪欲，或贪欲不是主要动力，那么，社会财富增多了，就应该走向孔子所向往的那种共同富裕的大同之世。然而，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在野蛮的高级阶段上，面对无度掠夺和厮杀，氏族制度已经无能为力。社会失控，面临着同归于尽的危险，各个利益冲突的集团就呼唤一个最强硬的拳头出来强行组织和支配社会走向秩序。于是王权、国家应运而生。相对于野蛮时代无序、无度的厮杀而言，礼制的出现，代表着秩序、进步与文明。所以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国家如何建立社会秩序？或曰靠暴力，或曰靠宗教，或其他手段。但维持社会有序运转，单靠暴力是不行的。我国黄淮流域的早期文明社会主要是靠礼制。从考古学上所看到的礼制遗存，可能有建筑基址、墓葬形制等，但更多见到的则是礼器，即所谓“器以载礼”。

不迟于龙山时代（公元前 2600~前 2000 年）已经有了礼器。礼器与用于夸富的贵重物品在社会功能上不同。贵重奢侈品（如数十、近百件的陶器、彩陶、象牙器、精致玉器、大量猪下颌骨等）所代表的是财富；而礼器所标示的是王权赋予的社会地位——贵族身份。迄今所见，还没有哪一座龙山时代大墓的随葬品，在数量上能超过大汶口文化大墓。但龙山大墓中的礼器却是上百件陶器所

不可取代的。在山西襄汾陶寺墓地上，只有 10%的墓有随葬品，其余一无所有。这十分之一的墓再按墓穴、棺槨、随葬品的规格又可分为若干等级。最高级的大墓，具有王者的气派，不仅墓穴特别大，而且随葬有 1.5 米高的陶鼓、1 米左右的鼉鼓、特磬，还有彩绘龙纹大盘。其他贵族墓虽也有彩绘陶器、木器、玉器等精品，却没有上述王者之器。山东泗水尹家城墓地情况近同。鼉鼓、石磬是中国商周王朝的重要礼器。制作这类磬和鼓的材料并不稀罕，其尊贵之处在于它的权威性，很可能是王权的象征。这就是礼器的本质所在。临朐朱封、日照两城镇也有类似的贵族分层的情况。多处墓地材料表明，不迟于龙山时代，丧葬礼制已具雏形。

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礼制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很丰富。如在殷墟王陵区，有四条墓道的王墓，有两条墓道、单墓道和无墓道不同级别的贵族之墓，等级分明。又如，西周早期的铜礼器，不少记载军功受赏，是为感谢天子之恩，借此祭祖，光耀门第而铸造的。西周的铜礼器相对于东周铜器而言，形制、花纹、文辞、字体都比较凝重，风格也较一致。它们很可能出自王朝“官工业”，体现王权权威，而非诸侯更非民间能自行生产、自由买卖的“商品”。

从古代文献，如《周礼》，可以知道，王权还通过礼制的渠道聚敛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一部分用于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维持社会秩序、维持统治暴力；另一部分用于供养一批脱离体力劳动的人，管观象授时、占卜、文字等，从事精神文明创造；再一部分，或许是更大的部分，则用于发展王室经济、官工业，以满足贵族政治和生活奢侈的需要，于是才有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精美物质文明成果。总之，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如果没有礼制来组织、维持统治秩序，如果没有王权的强制支配，原本就很少的剩余财富便会在野蛮的厮杀、无度的掠夺中消耗殆尽，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在博物馆所看到的精品。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文明时代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礼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是与黄淮流域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分不开的。黄淮流域古代先民也相信有死后世界。但他们把死后世界想象得和现世生活一样，因而把能享受的一切都为自己带到另一世界；他们也重视祭祀，但周礼反对泛神“淫祀”。“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以人为本”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王权至高无上，教权依附于王权。王权用世俗的规矩调节人世关系，有礼可依，有刑可行。如果神权至上，以神的意志主宰一切，社会秩序就是另一种体制、模式了。所以说，礼制综合体现了人本传统、王权至上、祖先崇拜等黄、淮流域传统文化因素，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我之所以把初期礼限定在黄淮流域，是因为在史前乃至文明时代初期，长江流域文化中巫文化因素占有重要地位，那里文明秩序的形成与初期发展，可能比黄淮流域要复杂一些。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文明时代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例如，王权本应是制约贪欲的，但帝王往往是最大的、无度的贪欲者。礼制是对贵族无度贪欲的制约，但却是极其有限的。如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符合新得天下的全体周人的利益，才有“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但是，当礼制带来的好处已成贵族囊中的陈旧之物的时候，礼制就失效了。“非礼”的弑杀、篡位层出不穷，不绝于史。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大声疾呼“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是呼吁“君子”，即贵族统治者，去身体力行的。历史上凡是吏治清明的朝代，社会上层的贪欲能够一定程度地得到制约，王权对剩余财富的再分配能多一点顾及社会下层，往往就能国泰民安，庶民也就得到一定喘息的机会。中外历史概莫能外。当然，随着文明社会的复杂化，作为社会前进动力的文明因素也多样化、复杂化起来。但就其本质而言，贪欲，统治者的贪欲，至少在 1894 年之前是如此。历史上没有纯粹的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发展的进程只是文明因素不断战胜野蛮因素的进程。



# 中国史前城址的地域特征及其平面布局初探

林留根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 一、中国史前城址的发现

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所发现的史前城址共有五十余座,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的内蒙古中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省、山东省和江苏北部地区;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长江中游湖北省南部和湖南省北部。时代当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亦即龙山时代。

## 二、中国史前城址的分布规律与文化背景

从自然地理环境看,中国史前城址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的河套地区以及中下游的黄淮平原,长江上游岷江流经的成都平原,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除河套地区的城址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山地外,其他城址均分布于广阔的平原上。将史前城址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宏大的文化背景中考察,则可发现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区,即黄河上游的北方文化区、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岷江文化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文化区。这五大文化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都有从早到晚的连续发展谱系,并且到了城址出现的龙山时代都有非常发达的农业基础。

徐旭生先生对中国古史传说研究的结果表明: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三大部族集团,即东夷集团、华夏集团和苗蛮集团,这三大集团所统治的地域与考古学文化所表现出的海岱文化区、中原文化区和江汉文化区大致相当。不同部族集团之间的文化角逐与碰撞、征伐与掠夺是促使中国史前城址产生的外部原因,而同一文化区内部的分化与冲突也是促使防御功能居于首位的史前城址产生的内部原因。

## 三、史前城址的地域特征

中国史前城址因分布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而这种地域特征突出体现在建筑技术上。每个文化区内的城址都有自身特点。江汉文化区和岷江文化区的城址堆筑技术特别发达,中原文化区的版筑技术则领先其他地区,海岱文化区的台城建筑技术则别具特色,北方文化区的岱海石城构筑技术则是因地制宜的最佳范例,可以说是北方长城构筑技术的滥觞。

北方文化区:岱海地区冬春冷而多风,聚落多选择背风向阳之地,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构筑城址,城址均依山势砌筑,故呈不规则形,有用石块砌筑的围墙,有的是先筑土垄再砌石墙。一般在缓坡部位筑墙,陡峭处不筑墙。沿山脊堆筑城垣、沿山坡建造房屋。

中原文化区:史前城址除西山仰韶城为圆形外,其余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基本都为方形或长方形。平面形制比较规整。长江流域的史前城址平面不甚规整,有的是利用自然岗地修筑而成的。海岱地区的城址也主要是利用自然“丘堆”加工而成的。中原地区虽然也有像古城寨城址利用漆水作为西面护城河的现象,但城垣都是夯筑而成,绝少利用自然岗地,而对城墙基础的处理则非常注重。

海岱文化区:龙山文化城可分两种,一种为台城,另一种为类似中原地区的挖筑基槽、平地起建的城。台城,多是利用丘堆修筑而成,外观高墙耸立,内看土岭环绕,外壁陡峭、内侧缓坡,城门门道为缓坡形。海岱地区的台城建筑技术多采用版筑、堆筑相结合,陡直的外壁和城门口多采用

版筑法，城垣内侧则采用堆筑法。采用版筑和堆筑相结合的筑城技术营造台城是海岱文化区的创造，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技术，海岱地区在龙山时代才可能出现大批的龙山城和龙山城组。

岷江文化区：城垣平面形制有的为长方形，有的为不规则的多边形，城址均未发现外城壕。城垣构筑和江汉地区相似，即从地面堆筑，不挖基槽。分水平夯筑和斜面夯筑两种，采用棍夯和板夯，带有极强的随意性。每座城址都有多次增筑、修筑的现象，这是因为成都平原洪水频发的缘故。

江汉文化区：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时期，在遗址周围有宏大的聚落围壕。其后，在围壕聚落的基础上修筑了城垣和城壕。屈家岭文化时期，在长江中游地区已普遍出现堆筑夯打的城垣和护城河。八十垱遗址的聚落围壕和围墙，其功能是防止洪水对聚落的侵袭和聚落内的积水排入围壕，而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的堆筑夯打的城垣和护城河，城址的功能也出现了质的变化，即除了自然防御之外，更多的是对战争的防御。

黄河流域的史前城址，除了西山仰韶城和西康留、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外，其他城址的时代多为龙山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其年代一般都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有的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稍早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古城，其规模一般都大于黄河流域的史前古城。

黄河中下游地区亦即中原文化区和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城址在建造过程中存在着埋设陶器和普遍使用人牲、动物作为奠基的风习，但此类情况不见于长江流域。

#### 四、史前城址的平面布局

由于城址本身的保存情况不佳，历代有诸多叠压打破关系，也由于发掘面积的限制，数十万平方米的城址往往只发掘几千或几百平方米，很难揭示出某座城址在某一时间段的平面布局，因而影响我们对中国史前城址内部平面布局作聚落形态的考察。在五十余座史前城址中，出现了少数两城结构的城址，一种为并列式，如王城岗，为东西两城并列，并共用一道中间城垣，西城内有夯土台基和灰坑、窖穴等，东城因被洪水冲毁，仅存西南角，城内情况不明。东西两城不会是时代上的早晚扩建，可能存在着功能上的区分。第二种为内外城式，如藤花落城址，存在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偏于外城的南部。内城发现夯土台基和大量的房屋建筑，而外城则主要为生产区，内外城存在着统一的使用年代，在功能上也有明显的区别，内城主要为保护居住区而设，外城则主要用来防止海水倒灌、山洪对生产区的破坏。第三种为大小城式，如边线王城址，小城废弃后，向外扩建外城，形成新的更大的外城圈；丹土城的三道城圈分别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中期城。

史前城址的城址内部已经有了严格的区划。有了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宗教活动区、生产区、墓葬区等。城内有主要道路或中心道路，出现了夯土台基和大型建筑基址。居住区有了等级的差异，道路在城内布局中起着经纬作用，多与城门、大型台基和广场等相连属。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基在中国史前城址的平面布局中起着核心凝聚作用。

龙山时代城址对于夏商周三代所代表的中国早期城市文明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构成王朝都城遗址的考古学遗迹要素主要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规模的夯土城垣、具有代表当时手工业最高发展水平的诸如铸铜、制玉等各种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城垣在王朝都城遗址中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各种手工业作坊在都城遗址中均有发现。所以说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宫殿宗庙遗存是中国早期城市——都邑最核心的内涵，因而成为判别是否是城市的决定性标志物。大型夯土高台建筑的建造需要庞大集中型的社会劳动，它的出现不仅是人们居住生活史上的一次革命，也因为它首先成为宫殿宗庙之所在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意义。龙山时代城邑中的大型夯土台基和大型礼仪性建筑无疑是三代都城遗址中的宫殿宗庙遗存的先声。

# 公元前 2000 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

王 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公元前 2000 纪左右,在我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化激变。在龙山时代(公元前 3000 纪),无论是黄河上游、下游,还是长江上、中、下游,都曾出现了一些十分发达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时期,各地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聚落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反映出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及与之相伴的人口的较大幅度的增加。然而,龙山时代结束后(即公元前 2000 年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各地的聚落数量锐减,规模也显著缩小,似乎反映出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上述地区的“强势文化”相继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出现。

耐人寻味的是,将上述地区新出现的诸考古学文化与原来存在于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后两者的文化面貌往往存在较大的差异,令人难以将其后者视为前者的直接继承者。虽然不能仅仅根据这些现象得出各地的文化真正发生了退步,但就文化发展的势头来看,以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为界,上述地区的文化和社会似乎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衰变。有迹象表明,这些区域曾一度各具特色的文明化进程并未沿着其原来的发展轨道完成其全过程便中途“夭折”或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被纳入到以中原地区夏商王朝为中心,或在其强烈影响下发展的轨道上来。

我们认为,距今 4000 年左右中华大地发生的大范围文化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气候的异常(主要表现是气温的降低和多雨及其所造成的洪水频发)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自然环境的原因变化并非唯一或主要的原因,而且它对各个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其影响较大,黄河下游地区其次,自然环境的变化可能是这些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和集团实力走下坡路的重要背景。然而,促使这些地区势力衰落的决定性原因应当不是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可能是这些地区的势力集团在与华夏集团的军事较量中处于下风,频繁的宗教祭祀活动又耗费着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由于气候变化而已濒临衰败的经济雪上加霜。这样,天灾加人祸,导致了这些曾经强盛一时的集团分崩离析,最终衰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华夏集团由于其所处的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采用了正确的抵御自然灾害的对策,其受到的影响相比于周围其他地区来说,程度较轻。治理洪水的成功也使得华夏集团的凝聚力和首长的权威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同时,由于不断地受到来自四面八方集团的挑战和文化的影晌,迫使华夏集团始终励精图治,保持活力,兼收并蓄,发展自己,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优势,在文化上保持了持续发展,在社会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以及在王权的强化方面实现了质的变化,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需要指出的是,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之后,周围地区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其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即从原来的以自己的独自发展为主的轨道,改变为在中原夏商王朝为核心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就中华文明形成的总体趋势而言,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到中原,经过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围地区辐射,到了商代二里岗期,商文化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进了各地区的文明进程,使其逐渐融入到以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体系之中。

# 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镶嵌铜牌饰

王青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

在中国早期文明的进程中，镶嵌铜牌饰是一种非常特殊而又神秘的铜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它的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据笔者的初步统计，截止到2002年，现存面世的镶嵌铜牌饰已达16件左右，其中现存国内的有7件，即河南偃师二里头3件，四川广汉三星堆真武2件，广汉高骊1件和近年报道的甘肃天水博物馆所藏1件；现存国外的有9件左右，即美国沙可乐博物馆3件，保罗·辛格医生收藏2件，檀香山艺术学院1件，日本MIHO博物馆1件，1991年英国伦敦古董行出现的1件以及1999年美国纽约古董市场新展出的1件。

1991年，李学勤先生最先对这种牌饰做了综合研究，其所引资料 and 精辟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此后又有许多学者曾就所见资料展开过讨论。最近，笔者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唯保罗·辛格医生所藏较大的一件尚未收集到），对这种牌饰的型式、年代、源流和寓意等问题做了初步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从分析铜牌饰的功用入手，对它与史前玉礼器和商周青铜礼器的关系，及其所反映的各族团之间关系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以阐述镶嵌铜牌饰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就材质而言，中国上古礼器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即史前盛行的玉礼器和商周及其以后流行的青铜礼器，而镶嵌铜牌饰作为一种青铜器，却浑身镶满属于“玉”范畴的绿松石。应该说，这正是它主要流行于夏代的时代特点使然；这一时代特点还决定了它能在纹饰和工艺上起到从史前到商周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实际上反映的是上古文化传统的某种继承和发展，并由此沉淀形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些重要特质；而它作为标识本族群文化传统的最重要礼器之一，还能透露出在史前夏代和夏商之际的社会激烈动荡期，各族群不断变迁和相互影响的一些历史信息，这些信息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某些固有传统在当时的不断传播与流散。这就是镶嵌铜牌饰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意义所在。

# 山东半岛旧石器晚期石器工艺技术的 复杂性多样性

沈辰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多伦多, 加拿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于 2000 - 2002 年度对山东旧石器晚期文化开展合作研究。特别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四个细石器遗址, 即凤凰岭、青峰岭、望海楼和黑龙潭, 所出土石制品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山东细石器过去已有人作了大量的工作, 也提出了“凤凰岭文化”的考古学观念。由于工作仅停留在材料的收集与综述方面, 缺乏对石器工艺技术的研究, 故在山东细石器遗存的石器工艺传统方面未能有实质讨论。本文就这批重要的遗存从石器技术上作区域工业传统的解析, 重新考察“凤凰岭文化”的考古内涵。对山东半岛旧石器晚期文化的观察提出几点初步认识, 以及今后对山东细石器工艺传统研究的思考。

本文对四个遗址石制品类型学和石器技术作了初步研究。从所分析的资料看, 仅四个遗址就有可能代表了至少两种不同的工业传统体系: 细石叶石核工艺和非细石器的石片-石核工艺。同时, 对其他一些采集点标本的观察, 结合野外调查, 认识到山东旧石器时代还可能存在另外几种石器制作工艺传统, 如汶泗流域的小型石片工具工艺传统等。

对山东细石器遗存的研究, 表明沂沭河流域的凤凰岭与青峰岭细石器, 从工艺技术、石料、工具组合等方面与鲁南马陵山地区的望海楼细石器有根本的不同, 可能代表了二种不同的工艺传统(或称凤凰岭传统和望海楼传统)。本文认为凤凰岭传统细石器工艺技术可能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业属同一体系, 而望海楼细石器传统可能代表了包含苏北在内的马陵山一带的细石器遗存的工艺技术。以黑龙潭遗存为代表的石片-石核工艺传统(或称黑龙潭传统), 在山东南部(如日照地区)比较普遍, 则可能代表当地由来已久、持续发展的传统工业。

对山东细石器的初步研究, 可以认为山东旧石器晚期的石器工艺传统远比我们过去认识的要复杂的多。现在看来, 山东地区可能有几种工艺传统共存, 有细石器工艺传统与非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交流。所以仅用“凤凰岭文化”概括是不全面的。用“凤凰岭文化”来表述山东旧石器晚期文化是忽视了该地区石器工业传统的变异性。这里, 我建议引入工艺传统概念而避免使用“文化”概念, 因而首先强调的是对石器制作技术的观察与分析, 从石器工艺技术的角度来考察山东地区的石器工业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山东细石器工艺传统究竟是因技术扩散于本地兴起还是由外部直接的迁徙传播, 但是只有了解了本地区的各类石器工业传统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文化关系, 才有可能解释细石器技术是何时或怎样被引入到山东, 随后向何处发展等等。所以, 对山东细石器工艺技术以及传统体系的深入研究, 是认识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与文化面貌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关键。

# 淮系文化纵论

高广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立论于前人研究的成果。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所论三集团说，其中的东夷集团是汉民族的主源之一。

二，东夷集团是个多族群集合体，至少可分为嵎夷、莱夷、淮夷，其下各有分支（见《禹贡》）；或可分为九夷（《后汉书·东夷传》）。东夷集团中以淮夷为最大群体。

三，淮夷的历史舞台主要在淮河流域两岸支流流域，包括嵩山以南、伏牛山以东、桐柏山、大别山以北的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东泰沂山脉以南的泗、沂流域。

四，淮夷文化的主源是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是与黄河中上游前仰韶文化并行发展的原始文化。李友谋先生研究认为河南境内的仰韶文化在年代上自西向东递减。由此可以认为，仰韶文化的西来，促成淮夷族群和裴李岗文化的东迁。“太昊之墟在陈”。

五，裴李岗文化，特别是以三足器、扁耳壶、磨盘、磨棒、陶铍、二次合葬、以犬为牲、以龟为灵、獠牙为特色的贾湖类型，大约在公元前 5500 年左右发生了沿汝、颍、涡诸淮河支流向东南方向的迁徙移民。他们绕过现今豫东的低湿洼地，给予淮河下游的土著文化以影响，形成了多源的侯家寨文化、石山子文化，最终在地利最好的淮河支流泗、沂流域安定下来，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结合，发展起了北辛文化。与此同时，裴李岗文化的另一支（族群或文化影响）西南行，给予豫西南丹江流域的下岗二期文化以影响。留在当地的裴李岗人后裔，与西来的仰韶文化族群相结合，形成两源的仰韶文化郑洛类型（有三足器的仰韶文化）。

六，属于淮夷系统的北辛文化起点高，成为海岱区文化的中坚，在与土著文化的互动、融合中，形成了大汶口文化的不同地方类型。而以属于淮夷文化系统的沂水流域早期刘林类型、晚期陵阳河类型和汶泗流域大汶口类型最先进。传说太昊系（风姓）以济水为根据地、少昊系（偃、嬴姓）以曲阜一带为大本营，不为无因。

七，夏王朝时期的“后羿代夏”是淮夷为主的东夷集团（传说中的寒浞可能属于嵎夷）入主中原的八十年。属于东夷集团的岳石文化（以及“斗鸡台文化”）给中原王朝文化（二里头文化）以明显影响；而岳石文化中却较少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夏王朝时期夷夏分野清楚，以淮夷为主的东夷集团保持着独立发展的势头。史书（《禹贡》、《竹书》、《后汉书》等）记载东夷向夏王朝进献舞乐，说明东夷具有高的文化水平。

八，商王朝代夏而兴，东进武装殖民、商礼浸润，彻底改变了东夷集团的历史命运。商王朝对鲁中南淮夷国族群的武功、文治力度最大、最深，郁夷族群次之，对莱夷的影响仅为强弩之末。淮夷旧国族中一部分接受商礼，成为商王朝的与国（从周初周公东征的镇压对象可知），相当一部分被迫南下，着力经营现今安徽境内的淮南、淮北地区及邻境地区。淮夷国族一方面与商王朝相抗衡，另一方面淮夷上层接受商王朝礼制（这一地区出土不少商王朝礼器）并向王朝“进贡”，淮夷集团开始走上不可逆转的夷夏融合的历史之路。

九，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天下形成，其东土以蒲姑、商奄为标志，其南土以巴、濮、楚、邓为标志，在东土、南土所夹的东南方，则是强大的淮夷集团的生存空间。周初王朝曾受到商遗和商化甚深的东土旧有夷殷国族，如商奄、徐夷、淮夷的强力反抗。一大批与西周王朝前期东征有关的金文以及《史密簋》、《师寰簋》、《晋侯稣钟》等铭文所载，就是对东夷，特别是淮夷反叛的武力镇压记录。被迫全线南迁的淮夷集团并未瓦解，而是在淮河两岸，特别是在江淮之间，建立了如徐、巢、卢、虎、江、黄、英、六、群舒等偃姓、嬴姓国族群（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譌异》）。由于周王朝以武功为推行周礼文治开路，所以，淮夷集团诸国族与西周王朝关系的态势，大体上是时叛时服，时而交恶、时而修好（如《宗周钟》等铭所见，以及文献所记徐偃王与周王朝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淮夷上层也以接受周礼为荣，淮河流域，主要是江淮之间，出土了不少代表西周王权权威、王朝礼制的青铜礼器。王朝用兵或礼遇淮夷，其主要目的之一，如商王朝一样，是为了取得“南金”。实际上，淮夷国族群与西周王朝之间的征伐与抗争、进贡（如“南金”）与赏赐（如西周王朝礼器），一方面发展了具有一定特色的淮夷文明，另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夷夏融合。

十，东周时期集中见于《春秋》、《左传》以徐、舒为代表淮夷国族，它们政治命运主要与齐、吴、楚相关联，直到春秋晚期包括徐国在内的淮夷国族群几经周折，汇入楚文化大系，历经战国时期的转揉，最终汇入秦汉帝国之中，成为夷夏共同体——汉民族的主要源头之一。考古所见东周时期的徐舒文明遗存，如河南光山黄国墓、徐州徐国墓、安徽舒城附近的群舒贵族墓等等，使我们看到在大国争霸、兼并、交流中，淮夷集团一方面不断吸收周文化、齐鲁、吴越、荆楚等文化圈的精华，同时也表现了鲜明的淮夷文化的特色，如牺首鼎、曲柄的袋足鬲形盃、簋、云纹鼎、弦纹鼎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兽首、蟠带等纹饰，在造型、纹饰、风格上与周式铜器差别较大（李国梁、杨立新等先生的论述）。徐国的铜器及铭文也提供了文献所不见研究徐夷文明的珍贵史料（董楚平等先生的著作）。淮夷国族的玉业也具有很高水平。淮夷文明是秦汉文明的源头之一，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丰富多彩做出了巨大贡献。

# 我国东方新石器时代中前期诸文化因素异同之辨正

徐基

(山东大学考古系)

本文论题的时空范围，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后的华北平原至长江下游平原的边海地区，即新石器时代中期（9.0—6.8KaBP）的我国东部地带。在这一广大区间，由北而南的沿边苍茫群山，均曾有早期人类栖息（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中间有川流不息的河流，二者合力，形成洪积与冲积平原；在山前平原地带，成为人类走出山地的第二落脚点。平原之上，河流湖沼遍布，微地貌虽较复杂，却又是人类开辟的第三个居住地。至此，这里的先民为了生计，至新石器时代中期便几乎走遍并占有了这块至今仍是我国最丰饶的东方宝地。古气候学家和地史学者告诉我们，距今8—6千年间，正值全新世走入高温盛期，亚热带的北界推移到本区中部的兖州——荷泽——郑州一线。充沛的降水、温润的气候、健全的生物链，既为本区居民提供着天然的生物食品，又适合农业耕作，促使原始的耜耕农业由此开始并得以初度繁荣，人类社会随着进步发展。但这里的居民从此因固着在有限的土地上发展农业文化，而不能也不必像他们的远祖那样随季节迁徙转移，因物候变化而游猎採撷。由于这一地区纬度跨度大（30—40° N），不同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了不同的经济类型，由南而北形成了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四、五个文化体系。以泰沂山脉为倚靠的海岱地区正巧座落在区域内的中间过渡地带，原居民的生存方式与观念，与北、与南都有些相似，又有些区别，形成一些很有谜趣的文化现象。总之，它们是各有特色的。

但是，它们是大体同步地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加上有许多共同的生活和精神需求，因此也产生（发明创造）了许多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如生产工具中的石铲、磨盘、磨棒，生活用品中的陶釜、支座和碗、钵、小口罐等。当然，因为山水相连，地域比邻，彼此间偶或有接触——碰撞与影响，甚或谱写出下一阶段开放性发展的前奏曲。各方面的资料表明，地理环境在人类生产力低下的早期社会，会很大程度地束缚着人们前进的脚步，阻碍着人们的联系与交往。因此，在我们认识和研究当时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比较它们的特点异同时，似不宜过高估计相邻或不相邻的人群之间的文化传播作用。而应当清醒地看到自然环境提供的丰富赐予和同时也设置的强大制约；更多地研考它们各自的文化源流，和为适应环境、创造条件满足基本的，也是共同的生活需求。这样，在不同群体间自会创造出或形成相似、乃至相同的诸多文化因素——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工艺技术。这其实是人类早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雷同现象。

人类社会经历了本阶段的初步发展与繁荣，迈步在7.0—6.0KaBP间，即本题论述的末端，正值全新世大暖期的稳定阶段，各文化共同体间，随着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长和技术技能的提高，开始了对辽阔平原的开发。人们的活动范围空前膨大，与外界的接触、交流也随着增多，文化因素传播及其影响力，大约也只在这个时段才初显威力，渐现其促进社会发展的巨大功效。至此，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不断碰撞、整合重组，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化趋同现象，并最终导致中华近古文明多元一体大局面的初显——仰韶文化前期、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艺术的传播即为突出的一例。本文拟对此前的文化现象予以探讨，希望得到与会专家的指正。



# 海岱文明的再思考

张学海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岱地区以山东为中心，居中国东部之中，是古夷族团的中心区。已知该地区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和发展中心之一，具有典型性。已经比较清楚的文化区系、聚落时空关系和较多的文献记载，使海岱文化区成为目前研究文明较为理想的地区。其史前聚落的存在形态经历了零散分布到成群分布的重大变化，反映了氏族、部落、国家的发展过程和以国家诞生为标志的文明诞生过程。

- (一) 距今 6500 年前的聚落寥寥无几，多是零散分布状态。这阶段的聚落基本上是独立氏族，自成经修单位和社会组织，是氏族时期。
- (二) 北辛文化晚期出现了聚落组（在特定地理小区间同时存在三四个聚落），聚落组归根到底由组内的一个老聚落发展成，并都发展成为聚落群（同一小区间同时存在 5 个以上聚落），实为雏形聚落群。它的出现，表明高于氏族组织的部落已经存在。
- (三) 聚落群可能产生于北辛文化晚期，最晚在大汶口文化初期，均由聚落组发展起来。组、群只是聚落多少之差，无性质之别；聚落群体无疑是部落。群体在经历了初期文化之后，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了快速发展势头，一部分部落率先迈出向国家过渡的步伐。当群内聚落发展成“都邑聚”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时，表明国家已从部落脱胎而出，海岱文明诞生。时当距今 5000 年前后，过渡期约达 700 年左右。
- (四) “都邑聚”的国家诞生标志，关键是“都”，部落向国家过渡，集中体现在部落中心向政治中心过渡的转变上，并首先实现这一转变。在这里国家的诞生不是通过暴力实现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改变管理机制的结果。
- (五) 海岱古国时代（海岱早期文明）
- (六) 中国不存在酋邦时期。

聚落群是部落和古国，虽然向国家过渡阶段的部落颇似酋邦，但称为过渡阶段，最后阶段的部落在理论上逻辑上更严谨，不必划出酋邦阶段（事关重大，划分与否可继续讨论）。如果一定要划，也只当大汶口文化中期，不能把龙山时代的古国包括其中，或把龙山时代的古国称为酋邦。

海岱文明的诞生过程和早期文明的基本状况，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文明的诞生过程及中华早期文明的基本状况，可对许多古史传记的可信性做出解释与正确理解。可知五帝时期万国论近乎事实，五帝有其人其国，他们是北部中国古国部落联盟的盟主，禅让制度并不可信，五帝时代不是“大同”社会，夏王朝的建立标志中国国家和中华文明进入发展新阶段，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而不是历史的倒退。

# 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栾丰实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教授)

海岱地区是一个考古学术语，又称为海岱文化区或海岱历史文化区，它是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来的。海岱地区的空间分布是以泰沂山系为中心，主要包括了黄河和淮河下游地区，地处中国的东方，其东临大海，西接中原，南北则分别与太湖、燕辽两大文化区相邻。

海岱地区的史前文化自成体系，也是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最主要的区系之一。这一体系先后经历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五个时期，而后经过商周两代的发展和融合，最终融入秦汉一统的中华古代文化洪流之中，成为中华古代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东方是夷人的居住地。西周时期，以海岱地区为主的东方被称为“东夷”，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中则称为“人(夷)方”，记载夏代史实的相关文献则为各种不同的夷，或称“九夷”。而夏代之前，则只有伯益、皋陶、蚩尤、少昊和太昊等，他们与后来的夷人具有一脉相承的传承关系。由于具有这一层关系，所以学术界一般认可东方史前文化的创造者为东夷族系。

基于上述，海岱地区在考古学上是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地区相对应的两个文化区，而两者负载体分别为古代东夷和华夏两大族系。

与其他地区一样，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即由简单的平等社会到复杂的分层社会，这一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深刻变化。从发展的历程分析，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 (一) 平等社会阶段

距今 8500—7000 年前后的后李文化属于这一阶段。

这一时期聚落内部的特点是出现了环壕、聚落内的房子分区分组、单间房子的面积较大并且有组合灶址。环壕是一种公共的防御设施，居住于环壕之内的人们当属同一个社会组织；聚落部的房子在空间上可以分不同的聚居区，每区有十余座房子不等；而房子区内又聚合成不同的组，每组三四座；单间房子的面积均较大，具有独立的消费功能的一般都在 30—50 平方米，并且存在由几个灶组成的组合灶，表明共同生活的人口数量较多，显然不是三五人的核心家庭。由以上分析可知，这一时期的聚落内部应该存在着四级结构，即“聚落—房子区—房子组—单体房子”。与以上聚落形态相对应，应该存在着四级社会组织，即“氏族联合体—氏族—家族—大家庭”。

后李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数量较少，在空间分布上相距较远，相互之间难于比较，故尚不清楚是否存在比聚落更高的社会组织形式。

后李文化的房子内部只保存着日常生活必需的陶器和工具，而墓葬的之间排列整齐，墓坑大小相若，没有或极少有随葬品，反映了一种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财富较为贫乏、社会内部的分化尚未出现的社会现象。所以，一般认为这时还处于较早时期的平等社会时期。

## (二) 由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阶段

距今 7000—5500 年，海岱地区进入了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从社会发展方面观察，这一时期的海岱地区属于从平等社会向分层社会的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的聚落内部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可供独立生活的单体房子规模变小，房子使用面积基本上都在 20 平方米以下，多数不超过 10 平方米。这种情况表明已经出现了人口数量较少的社会组织单位，如果要把这种人口规模的单位和我们所知的社会组织相对应，那只能和核心家庭相联系。聚落形态显示聚落内部仍然为四级结构，即“聚落—房子区—房子组—单体房子”，只是聚落内部最小的组织单位裂变为核心家庭。

这一时期海岱地区发现的聚落遗址只有 100 余处，宏观聚落资料的不足使我们无法准确地分析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不过从这一时期的聚落数量明显超过后李文化，并且分布上也要密集得多，所以，聚落之间可能出现了小范围的社会组织。如果和已知的社会相对应，应该是部落这一层级。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后期，像比较发达的大汶口一带，应该出现了相互之间有等级差别的聚落群，中心遗址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墓地中墓葬的聚合状况，一般表现为三级结构，即“墓地、墓群和墓组”，可分别与前述聚落分析中的前三个层次相对应，从而与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结构相吻合。

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社会生产在缓慢发展，社会财富也在逐渐地积累之中。我们从聚落特别是墓葬资料中看到的情况是，社会成员之间在占有社会财富方面的差别已经出现但并不严重，但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则是十分明显的。以至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后期，在个别地区这一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像大汶口遗址出现的墓室较大、有木棺葬具、随葬品多达一百余件的富有之墓，则是分化速度加快的集中体现。

从总体上说，这一阶段海岱地区的社会内部已发生变化，开始由平等社会向不平等的分层社会发展过渡。当然，不同的区域在分化程度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 （三）分层社会阶段

距今 5500—3500 年，海岱地区处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中期是海岱地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社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在外部，大汶口文化的势力开始向中原地区扩张，而内部，社会分化的速度加快，程度加剧。在区域聚落形态方面，一批具有中心地位的聚落遗址开始出现，如邹县野店、新沂花厅、章丘焦家、泰安大汶口等，聚落群内部的等级结构已经形成。在聚落内部，小型的家族墓地开始兴起，墓葬之间的分化日益明显，处于分层社会的形成时期。

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群普遍出现，而由大中小型聚落遗址构筑成的三层结构的金字塔形聚落群明确形成。如陵阳河地区的聚落群，在发现的 42 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大型聚落遗址只有陵阳河一处，而中型聚落遗址则有大朱家村等六七处，小型聚落遗址多达 30 余处。其中一些中心聚落开始出现城防设施，如五莲丹土遗址，就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这一时期小型家族墓地成为墓葬的主流，墓葬之间的分化十分严重，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单个墓葬之间，也表现在代表家族的墓地之间。墓葬中代表礼制的器具增多并逐渐形成制度。

到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三层结构的聚落群在海岱地区已经十分普遍，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四层聚落形态，如日照两城地区。这一时期聚落形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数中心聚落有构筑的城墙及环绕城墙的壕沟，面积一般在 10—30 万平方米之间，最大者接近百万平方米。墓葬以家族墓地为主，不同家族之间的分化严重，在临朐西朱封、泗水尹家城等遗址发现了重棺一椁、墓室面积超

过 20 平方米、随葬有成套的精美礼器的大型墓葬。而小墓贫墓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墓室也小的可怜，相当数量面积只有 1 平方米左右，仅可容身。社会分层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综上所述，海岱地区古代社会的演进可以归结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社会处在平等社会及向分层社会的过渡时期，或可称为部落社会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聚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加剧，聚落之间至少形成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两级聚落形态（个别地区可能形成了三级聚落形态），文明社会的因素不断积累和增加；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具有“都、邑、聚”结构的三级聚落形态比较普遍地出现，具有早期国家形态的古国开始产生，从这一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某些发达地区开始进入古国时代的文明社会；龙山文化时期，具有早期国家性质的古国不仅更为普遍，而且某些先进地区可能已经产生古国联盟，即方国时代；而岳石文化时期，已经步入了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王国时代；秦汉帝国一统天下，中国开始了帝国时代。所以，中国古代由原始到文明，进而循着“古国—方国—王国—帝国”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 山东史前考古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佟佩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山东史前考古研究成果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提供了最具科学价值、最具说明力的基础资料

山东位于中纬度偏南的亚欧大陆东部，属暖温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四季分明，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是古代先民农耕、渔猎和栖息的理想场所。

山东的近代考古工作，自 1928 年在章丘龙山镇发现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开始，经过 70 多年的艰难探索，逐步建立起持续不断、先后承袭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表明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山东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大致为沂源猿人（距今四十万年左右）、新泰乌珠台人（距今 5—2 万年左右）、后李文化（距今 8400—7700 年左右）、北辛文化（距今 7300—6100 年左右）、龙山文化（距今 4600—4000 年左右）、岳石文化（距今 4000—3600 年左右）和诸历史时期文化。其主干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间跨度近 4000 年。

在与周围地区同时期文化的比较中，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绝大多数时间表现为强势，是我们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对象。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农业和饲养业已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制陶业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中国制陶业的繁荣阶段。

在制石、制玉、制骨技术上，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已应用切割法和管钻法，透雕镶嵌和磨光抛光技术已广泛使用。

代表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制铜业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大型夯土台基和城址的出现，表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建筑技术和建筑能力有了较快的发展和提高。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富，必然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出的诸多文明要素，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内涵中大多有所显现：

关于社会分工，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问题

关于文字产生和形成问题

关于礼制、祭祀和宗教问题

关于礼仪性建筑和城址的性质问题……

二、山东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景、局限和对策问题

a) 前景问题

积累的丰富考古资料提供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方向和线索。

山东是古代东夷族的聚居地，相当客观地历史文献记载了众多可信的传说。用考古资料印证历史记载，从历史学、社会学和考古学结合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是重要途径之一。

目前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山东大学考古系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单位都正在围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课题，集中力量、明确方向、加大田野考古和科学研究的力度，估计三、五年内将会取得较大的阶段性成果。

b) 局限性问题的

缺乏典型的个案资料和系统的区域资料。缺乏成熟的指导理论和科学的判定方法。

c) 对策问题的

进一步提高考古工作的目的性，加强重点城址的发掘工作。希望继续做好日照两城镇遗址（山东大学考古系）、临淄桐林遗址（北京大学考古系、山东省考古研究所）、莒平教场铺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谷景阳岗遗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莲丹土遗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邹平丁公遗址（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发掘工作，进一步搞清城址的布局、结构、年代、分期、功能和性质等问题，努力寻找与城址同时期的墓地。

进一步开展以重点遗址为中心的区域性调查工作，希望继续做好以两城镇和丹土遗址为中心的日照地区（山东大学考古系）和以探寻齐国早期城址为课题的鲁北地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调查工作，积极启动以景阳岗和教场铺遗址为中心的鲁西地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桐林遗址为中心的临淄地区（北京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城子崖遗址为中心的章丘地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区域性考古调查工作，以聚落形态考古的视角，提高综合研究水平。

加大运用自然科学手段的力度，进一步提高考古工作中的各种信息“量化”的层次水平，从“量变”的积累上寻求“质变”的飞跃。

进一步抓紧现有田野考古资料的整理工作。

进一步加强理论的探讨和方法的研究工作。

进一步加强相关考古单位的协调工作。轮流坐庄，争取每年召开一次现场观摩讨论会，以一个遗址或一个区域的考古成果为主要内容，介绍工作进展情况，畅谈认识感想，交流课题规划。

## 从陵阳河与大朱村发现陶尊文字谈起

王树明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首先对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发现的陶尊文字类资料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安徽蒙城尉迟寺的考古发现以及在文献资料中又收集的一些有关材料，对原来所作结论中，有笔墨未到或讹误之处，做了一些说明和更订；同时，对有的学者对笔者过去在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发现陶尊文字类刻画的解说中，提出异议或观点有所不同的相关论说，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回答。

其次是讨论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的陶尊文字和图像类刻画。蒙城尉迟寺发现的陶尊文字资料中，仅“旦”字远祖的发现为前所未见。其余四字与一图像刻画，与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发现的形体特征或者完全一致，也或脱胎于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发现的同类刻画。从而论定，安徽蒙城尉迟寺一带发现陶尊文字和刻画类图像，是由诸城、莒县一带使用陶尊文字的帝舜太昊部族或其部，迁居蒙城一带蕃息而留下的物质子遗。

最后，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及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遗迹提供的内证，又进而论定，安徽蒙城尉迟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是居住在今山东诸城、莒县一带的帝舜太昊部族或其部，在其西徙过程中曾经居住过的一个都城。

# 大汶口遗址的随葬石器

岩崎厚志

(日本 国学院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助教)

我曾经对上海地区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的石器进行过分析，得出男性墓和女性墓之间，不仅时期不同其随葬的石器组合不同，而且性别不同其组合也不同的结论。这次我对大汶口遗址墓葬资料的分析，主要是考察各墓葬随葬品与埋葬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当时随葬行为的规律性及其社会结构和背景。

到目前为止，大汶口遗址共发现墓葬 189 座，其中单人墓为 173 座，合葬墓为 16 座。在此我只采用单人墓资料，因为其随葬品与埋葬者的关系十分清楚。按性别鉴定的结果，单人墓有 33 座为男性墓，30 座为女性墓，16 座为儿童墓，其他 94 座情况不明。其中，随葬斧、凿、铲等石质工具或武器的有 56 座：其中男性墓占 32%，女性墓占 14%，儿童墓占 3%，情况不明的占 51%。另外，随葬石纺轮或陶纺轮的有 22 座：其中男性墓占 9%，女性墓占 32%，情况不明的占 59%。根据以上数据可知，工具与武器多见于男性墓，纺轮集中见于女性墓。可见，当时在随葬品组合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女性墓也随葬石质工具和武器的，而且这些女性墓多伴出有孔石斧与纺轮，加之整个墓地的布局整齐有序，没有离开墓地而独立存在于其他地方的墓葬，这一点也相当重要。

总之，在随葬品的内容与数量上，大汶口文化时期不仅有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而且也有个别的差异。这种现象也可见于长江下游区域：如崧泽文化时期，有些女性墓葬中也发现有石质工具或武器，但到良渚文化时期这种石器只见于男性墓。除此之外，良渚文化期装饰品和礼器性随葬品有了明显的发展，同时，一部分墓葬与其他墓葬分离的现象也十分突出。这样，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两个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墓葬随葬品的差异和性别差异同时出现。我认为，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阶层差别的出现，而只是由于每个人的性别或技能的不同，才出现多样化的生产活动及其生产活动相关的随葬品。社会阶层的分化，应该是在部分墓葬开始独立分布，少数人占有稀少物品的时代才出现的。



# 龙山时代中原与海岱地区文化分布格局的比较

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一、中原龙山文化：向心式

(一) 中心地区：嵩山周围的王湾三期文化

1、核心区：伊洛平原；2、周临区：伊洛平原周临有一周聚落群

(二) 外围区

- 1、东边：造律台类型
- 2、南边：杨庄二期类型
- 3、西南：下王岗类型
- 4、西边：三里桥类型
- 5、北边：后冈类型
- 6、西北边：陶寺类型（文化）

## 二、海岱龙山文化：并立式

(一) 缺乏核心区与中心区

(二) 并立的类型有：城子崖类型、姚官庄类型、尹家城类型、尧王城类型、杨家圈类型

## 三、文化分布格局的比较

- 1、从整体上观察，中原龙山文化呈现向心式文化分布格局，而海岱地区呈现出并立式文化分布格局
- 2、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向心式分布格局当中，王油坊类型只是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之间的一支地方类型，如同三里桥类型是介于王湾三期文化与客省庄文化之间的地方类型一样，实乃中原龙山文化的一支，不宜划入海岱龙山文化圈。
- 3、中原的向心式文化分布格局可称为中原模式，最终导致王国文明的诞生，使中原地区率先迈入王国文明阶段；海岱地区的并立式文化分布格局可称为海岱模式，最终导致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滞留在邦国时代。

# 商代海岱地区之考古文化

## ——再论岳石文化的消亡过程

黄川田修

(日本 明治大学大学员博士后)

海岱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发端于 30 年代进行的考古调查及发掘。通过至今 70 年的中国及国外学者们的努力，根据我们现在已掌握的材料，该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考古文化的序列为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与商文化。另外，商周时期在淄河以东还有土著性考古文化，如芝水二期文化与珍珠门文化。

在上述的考古文化中，岳石文化是探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问题时非常重要的文化之一。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从中原地区波及到更高度的文明阶段呢？本文作者将就此课题展开讨论。

对于岳石文化的下限年代，不少学者们一向认为大约是二里岗上层。但是学者们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关于其详细年代及消亡过程的论述尚属模糊。此次笔者为了探究岳石文化消亡过程，不仅将再探讨岳石文化的分期轮廓，而且会系统地追踪该区的包含商周文化的遗址的动态。

通过上述分析，关于岳石文化的消亡过程笔者提出一个假设：岳石文化的年代下限比以前我们推测的要晚几百年，于淄河以西其消亡年代大约为商代晚期；而且，于淄河以东其年代可能更晚些。在商代的海岱地区，从属商王朝的邑不仅很分散的存在，其延续时间也很短，而且他们占领的地域仅限于淄河以西，对海岱地区商王朝的影响力很有限，商代早期至晚期在该区最主要的考古文化可能一直是岳石文化。据笔者的分析，岳石文化的遗存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上层，后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白家庄期到殷墟四期。前者遗存的代表为泗水尹家城与牟平照格庄，后者为烟台芝水第一期、青州郝家庄与桓台史家。

正如从来不少学者指摘，殷墟卜辞中我们能看到商王朝在商代晚期对山东方面出兵、伐“人方”这样的记述。如果上述假设成立，则笔者所说的“岳石文化后期遗存”和“人方”一定有密切的关系。

# 关于辽西区文明起源道路与特点的思考

郭大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古文化的辽西区，以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为主，波及到燕山以南的京津唐地区，是探索燕山南北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点地区。

这一地区是我国近代考古开始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 1921 年就有安特生 (J. G. Andersson) 对锦西沙锅屯遗址的发掘，1930 年梁思永先生又对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进行过调查，但五六十年代由于缺乏大规模发掘和系统资料的积累与发表，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相比，显得平静。直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辽宁省朝阳地区、内蒙古敖汉旗文物普查的开展，喀左县东山嘴、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牛河梁、敖汉旗大甸子等一些重点遗址的发掘和一系列新的考古文化的建立，使辽西区古文化的研究，不仅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而且有面貌一新之感。当时全国考古学的研究形势已逐渐进入由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向文明起源的讨论过渡的阶段，辽西区作为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试点，这两方面研究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文化序列作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辽西区已基本建立起来。这一地区在 60 年代有两种新石器文化即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与两种青铜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辨认。70 年代以来，新石器时代建立起早于红山文化的查海—兴隆洼文化，较红山文化时代为早或与红山文化早期时代相当的赵宝沟文化，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并据此提出了“红山诸文化”的概念；青铜时代将夏家店下层文化确认在夏代范围，提出了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相当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的商周之际前后的魏营子文化，在渤海湾北岸发现了秦行宫遗址群，从而揭示出辽西区古文化发展阶段和水平与中原地区大致同步又起落较大的规律。

辽西区作为中国文明起源讨论的一个重点地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首先是从这一地区古文化研究中提出来的。国家起源的“三部曲”与“三模式”的系统论述，也大都于辽西区古文化有关。苏秉琦先生从辽西区古文化得出的这些新结论，也是研究辽西区文明起源的指导思想。

辽西区文明起源研究，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由此提出的 5000 年古国最为重要。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西名山努鲁儿虎山山谷间绵延十余公里的多道山梁上，由坐落在主梁顶部的女神庙和各山冈上的积石冢群和祭坛组成，形成“坛庙冢”三位一体、主次有序、占地 50 平方公里的大规模祭祀遗址群，从中可以分析出辽西区文明起源的一些具体道路和特点。

一是明确的社会分层。坐落在各个山冈上的积石冢或冢群，可视为社会基本单元；每个山冈上冢界分明的诸冢，各为次单元；冢内成行排列的组墓和每个墓葬，当然是更小也是最基层的单元。界限分明的冈、冢、行、墓，是社会组织层次分明的表现。

二是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分化及其在宗教上被固定下来。积石冢以拥有中心大墓为最大特点。中心大墓一冈一座，位于冈顶中央，有宽而深的墓穴，有的墓穴直接凿入风化基岩甚至坚硬的岩石上，墓壁起台阶，穴内砌筑巨大而整齐的石棺，随葬品只有玉器，玉器以选料精的大件龙、凤、龟等动物形玉、勾云形佩和特型玉等为基本组合。其他墓葬和设施，如立于冢界石阶内成排的陶筒形器，都围绕中心大墓而设，冢上积石层层叠起，充分显示中心大墓主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女

神庙为有主室和左右室、前后室的多室相连的半地穴结构，试掘出土的泥塑神像中，相当于真人 3 倍的主神，位于庙的主室中央，其他各室有相当于真人 2 倍和多个相当于真人原大的群神以及熊、鹰等动物神，这种围绕主神的群神组合，当是人间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关系在宗教上的反映。

三是最高层次的超中心聚落的出现。牛河梁祭祀遗址群坐落在红山文化四通八达的分布区的中心，它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独立于居住区之外，依山势按轴线而分布，讲究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结合，这显然不是一个氏族或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是这一文化共同体祭祀先祖的“圣地”和活动中心。

以上充分体现的，是以人与祖先神、人与天的沟通为惟一和最终目的的祭祀礼仪，是通神权及其独占。随葬的玉礼器以及积石冢上的陶筒形器群，可能都是沟通神人间的工具与法器。中心大墓的主人，首先是掌握神权的巫者，同时也是王者。

至于在牛河梁遗址还可以看到一些原始氏族公社成分的保留，如一冈多冢和有中心大墓的冢内有时还有其他墓葬；女神庙半地穴式和多室又联为一体的结构；遗址群布局规范中有变的情况等等，正是“古文化古城古国”特定含义即“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典型表现。这个“政治实体”以通神独占的祭祀为中心，又是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所在。

张光直先生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道路和特点不同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观点，即与西方侧重于发展技术、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有所不同的东方文明，以通神取得政治权力、与自然和谐沟通的“连续性文明”为特征，这一观点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史前时期考古发现的支持，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以动物题材为主的玉礼器的发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证。

以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古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查海—兴隆洼文化，就已出现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的现象，如聚落内部房址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行排列等所反映的社会单元的层次性，出现专业制作和专人使用的玉器和龙形象崇拜，被视为已进入“上万年的文明起步”阶段。赵宝沟文化聚落内部居住与祭祀不同功能遗迹的分区和层次性分化的发展以及以“四灵”纹陶尊为代表的超水平神器的出现，以富河文化为代表的狩猎畜牧等多种经济类型的古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错分布，都对红山文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之后的小河沿文化，虽然处于低潮，但过渡期往往有新因素出现，如彩绘陶，从而为辽西区距今四千年前后又一个繁荣期的出现，即夏家店下层文化方国阶段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它们都属于国家起源中“原生型”模式。

辽西区还是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西部游牧区交汇的前沿地带。东北区古文化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彩陶等先进因素，促成了红山文化的形成；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由华山脚下沿太行山西麓北上，在桑干河上游与由辽西区南下的红山文化，南北接触“碰撞”，对红山文化进一步发展为古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属于“筒形罐”文化圈的辽西区与属于“鼎文化圈”的海岱区，虽然文化区系不同，却同属面向海洋的大区和环渤海文化区。它们之间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大汶口文化中不仅有红山文化式的多联玉璧发现，而且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这南北两大原生玉文化中心的交流，大汶口文化应是主要媒介。此后小河沿文化接受大汶口文化的强烈影响而面貌大变，并南下华北平原，与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共同“逐鹿中原”，形成具多元综合体性质的陶寺文化，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基础，显示出从东北南部的辽西地区经山东半岛到长江下游的沿海弧形地带的史前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绝不是配角，说他们在某些时候曾起到主导作用，也并不为过。

# 长江下游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宋 建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中国的文明化进程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演进过程。长江下游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速度最快、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文明起源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江下游的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始于崧泽—良渚过渡阶段。距今大约 5500 年时，长江下游的自然环境出现了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明显变化。环境的优劣同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这在长江三角洲前端的环太湖地区尤为重要。这里自然地理的特征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海拔高度比较低，洼地中心高出平均海面只有 2—4 米。区域内分布着广阔的水域，地貌形态受到海平面和长江水量变化的控制，制约先民的生存空间。考古资料显示，崧泽文化晚期以后三角洲前端遗址的数量增加。据统计，良渚文化早期遗址的数量是崧泽文化晚期的两倍以上。遗址数量的快速增加，既是原住民大量繁衍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外来人口迁入，在原来不适合生存的环太湖地区开始定居生活的证据。此时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创造出本地区自有人类居住以来最繁荣的物质文化。自然环境的良性转变是早期文明走向繁盛的基本要素之一。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进入公元前第 3000 年时长江下游的早期文明达到了巅峰，城乡分化，社会等级关系十分复杂。城乡分化使得聚落分布和组成结构完全不同于以往。城垣并非是城所必备的，城所必备的是政治权利、物质财富和人口分布的高度集中。良渚文明城乡分化表现为聚落组成为多层的金字塔形结构，金字塔尖端在浙江余杭的良渚与瓶窑，这里是良渚文明的中心。虽然城垣是否存在尚未确认，但是根据最新的调查统计，在 33.8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共分布着 100 多处遗址，组成了相互关系密切的遗址群，成为长江下游遗址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莫角山在遗址群的中央，长方形，正方向，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规模极为宏大。莫角山遗址上有三座土台，发掘和调查表明，土台之间有一块 3 万平方米左右的夯土基址。莫角山周围分布着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祭坛和高层贵族墓地，它们共同体现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的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是城乡分化的顶端。金字塔的高端以玉琮为中心，目前随葬玉琮的墓地和曾经出土过玉琮的地点已有数十处，如草鞋山、福泉山、寺墩等，他们是良渚文明的次级中心。城乡分化金字塔中端和底端是不能使用玉琮和很少使用玉器的中下层聚落。分化为 3—4 层的聚落形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即以金字塔尖端为最高统治集团的、多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社会复杂化的一个明显标志。

目前已经确认的良渚文明次级中心都分布在杭嘉湖平原和太湖、东太湖平原，而钱塘江、富春江以南几乎是空白。其原因除了自然环境的阻隔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外，还有潜在的宗教心理因素和宗教的控制能力，从而显示出政治和经济在更广泛范围的相对集中。

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结构同样复杂。从墓葬的规模等级看，良渚文化的社会成员分五个阶层，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标志物是随葬玉琮和玉钺，他们掌握了最高的神权、政权和兵权。第一阶层的墓葬在良渚文化的最高中心，如余杭反山 M12，最近了解的材料显示，墓主一手持钺，一手还握着一柄特殊的杖，不由得使人联想到《书·牧誓》中关于武王持黄钺和白旄的记载，M12 的墓主应该就是“良渚国”的国王。第二阶层在次级中心，如青浦福泉山 M65。这两个阶层分别是两级中心某一特定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第三阶层的墓葬以随葬大量玉器为特征，大多数在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

根据随葬玉器的不同种类，第三阶层还可以细分，分别代表贵族集团内部的不同身份与职掌。第一至第三阶层属于上层贵族，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第四阶层的墓葬只随葬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个别有少量小件玉器。这一阶层主要为社会普通成员，属于平民阶层。第五阶层的墓葬不随葬任何器物，可以看作是平民阶层中的贫穷者，一般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最低。

良渚文明以宗教为源泉、社会组织高度一体化，各层贵族以宗教的力量掌握不同的政治运作权与财富支配权。为了使社会机器顺利运转，良渚人一直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投入到各层贵族的精神活动领域，其物质反映就是遍布于各地的祭坛、大量精美玉器的生产、使用和随葬。贵族统治者通过此类活动弘扬其意识观念，并从中获取和加强管理社会的力量。可以说良渚社会各层面的活动均以玉为中心，玉是良渚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在显示宗教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并藉以促进群体内的向心程度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良渚文明已经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并且初步掌握了运用文字的技巧。根据对马桥、澄湖、南湖等地陶文的研究，良渚先民除了以象形的形式创造文字，会意、指事等造字方法也应该已经产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将若干个单字组成句子以表达对事物完整的叙述。只是因材料太少而问题太多，目前只能将这些陶文称之为原始文字。

良渚文明进入巅峰后进入维持阶段，又经历了比较长的衰变过程。作为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地和良渚文明的最高中心，良渚一瓶窑地区在中期极其繁荣，但是目前还没有考古材料能够表明晚期继续保持繁荣。对早年从这里出土流失的玉器不能确认，又没有发现晚期高层贵族的墓葬，这应该看作良渚文明最高中心处于衰退中的征兆。在次级中心，目前仅在福泉山和寺墩等少数几个地点发现了个别晚期的上层贵族墓葬，但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在走下坡路。良渚文明的衰变是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文明化发展过程。目前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正在共同努力探讨良渚文明衰变的动因。我认为良渚文明是在几种不同因素的作用下，逐渐走向衰变。

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否和谐同社会的发展或衰退密切相关。自然环境的优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原因之一，文明进程出现停滞则可能有环境恶化的背景。虽然并没有材料能够支持良渚文明彻底毁于洪水，但是洪灾频发确实是水网低地环境恶化的主要形式。良渚中期以后马桥遗址遭受了洪水的侵袭，其他考古资料也显示村落被洪水冲毁或淹没的迹象。但是在马桥的洪水堆积层上埋有良渚晚期的墓葬，证明良渚中期后的洪水并没有毁灭良渚文明。文明化进程虽然停滞，却没有消失。

良渚文明的社会运作形式很独特，极端依赖于宗教，在宗教旗下，良渚文明的社会运行机制具有惊人的力量，宗教是良渚文明兴盛的基础，也是调节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乃至各成员相互关系的溶化、融合剂。但是，这样的运作机制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众多的宗教活动几乎都是纯消耗性的开支，需要大量的经济活动支撑，农业是获得生活资源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生产能力如果与宗教活动的消耗失去平衡，后果是灾难性的。农业生产能力的强弱又依赖于自然环境。玉器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物质，良渚文明的社会运作不能缺少玉。农业经济、自然环境、玉器制作等，共同组成了一条由多个大小环节组成的社会链，一旦缺失若干个环节，整个社会链就会断裂。良渚文明是在社会链的断裂与弥补的矛盾中逐渐衰变的。

良渚文明在衰变的最后阶段，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侵扰，其中有的来自于黄河流域，以王油坊类型的特征最为明显；有的来自于南方地区以几何形印纹为特征的文化遗存。目前已有迹象表明距今大约 4000 年时，长江下游地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动荡。最终同王油坊类型关系紧密的广富林遗存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取代了良渚文化。地区文明走完了发展、到达巅峰、逐渐衰变到消亡的全过程。

# 长江下游史前聚落的量化分析

高蒙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 一、聚落的时间分布尺度

聚落考古研究的基础之一是对遗址群的时空位置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有三：

第一，遗址的时间分布，以遗址分期的年代数据为基础；

第二，遗址的平面空间分布，主要考察遗址数量和分布疏密度；

第三，遗址的垂直空间分布，主要考察遗址地貌、遗存堆积的连续性或断层情况。

本文的重点是对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的时间分布情况进行量化分析。

长江下游的史前聚落考古研究，通常是以各个典型考古学文化的起讫时限作为聚落存在的基本时间单位的，如马家浜文化 1200 年，崧泽文化 600 年，良渚文化 1200 年。换言之，依据各个文化兴衰时限所定位的聚落年代跨度，多在千年尺度左右。

实际上，对这三个文化的考古分期研究，目前已经细化到平均每个文化内部又能分为早中晚三个小期的程度，甚至良渚文化还有四期——六期之说。因此，这三个文化至少可分为九期，这意味着这一地区的聚落分期，存在着可以采取量化手段，提供 400—200 年高分辨率尺度的可能性，进而可以使我们变趋势性观察为过程性研究，并从中提取到更多的人地关系演变信息。

## 二、遗址堆积的高分辨率统计分析

本文全面收集了长江下游能够进行细化分期的约 500 处遗址堆积，着重对聚落量值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并加以平面图、柱状图、曲线图和表格化处理。结果显示：

1、马家浜时期：早期 17 处，中期 30 处，晚期 39 处。

表明在距今 7000—6600 年期间的马家浜早期的 400 年里，长江下游人类活动的地点不多。到距今 6600 年的中期以后，人类活动的地点开始成倍增长。在马家浜时期，这一现象持续了两个时期约 800 年时间。

2、崧泽时期：早期 29 处，中期 52 处，晚期 58 处。

表明在距今 5800—5600 年的早期的共计 200 年里，长江下游特别是太湖地区人类活动的地点非但不多，而且还少于比这一时期早的马家浜晚期，出现了一个数量低谷现象。到距今 5400 年的崧泽中期以后，人类活动的地点又开始成倍增长，这一现象持续了两个时期约 400 年时间，并一直延续到距今 5200 年崧泽时期结束和良渚时期伊始。

3、良渚时期：早期 87 处，中期 107 处，晚期 110 处。

表明在距今 5200—4800 年的早期的 400 年里，长江下游人类活动的地点继崧泽晚期后持续增长。到距今 4800 年的中期以后，人类活动的地点开始进入长江下游有史以来人类活动的最高峰值期，这一现象持续了三个时期约 1100 年时间，直到距今 3700 年马桥早期结束为止。

# 关于环太湖地区原始文化的思考

张 敏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 一、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太湖东部与西部

马家浜文化时期，太湖的东部与西部存在两个中心文化。

## 二、崧泽文化的西渐与北进

崧泽文化时期，崧泽文化主要向宁镇地区渗透并向江淮东部地区扩张。

## 三、良渚文化的一支独秀

良渚文化时期，西部的宁镇地区和北部的江淮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都突然消失，仅存良渚文化一支独秀。

## 四、结语

从太湖地区邻境的宁镇地区和江淮地区的角度对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进行动态的审视和考察，大致可归纳如下：

在马家浜文化时期，太湖地区的东部和西部存在两个中心文化，这两个中心文化互有向心作用，并各自呈半月形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最终演进为一统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西渐和北进，不断地向宁镇地区渗透和向江淮东部扩张；

至迟在良渚文化早期，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先民彻底毁灭了宁镇地区和江淮东部的原始文化，在邻境地区原始文化遭受毁灭的基础上，铸就了良渚文化的辉煌。良渚文化的突然兴起和繁荣昌盛，无疑为华夏文明起源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揭示其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思考如何从整个东南沿海诸考古学文化的兴衰对良渚文化进行反思和反省。



# 关于良渚遗址群的若干问题

杨楠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

良渚遗址群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北郊，地跨瓶窑、安溪、良渚三镇。随着系统调查的深入展开，遗址群的遗址数量不断增加，遗址群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近年新的调查资料显示，遗址群内确认的遗址已达 100 多处，其分布范围近 50 平方公里。遗址群因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存的发现而倍受瞩目。同时，如何把遗址群的考古工作与科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也应该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

## 一、遗址群内诸遗址之间的年代关系

遗址群内已知年代最早的遗存是马家浜文化遗存，分布较为稀疏。较单纯的崧泽文化遗存尚未明确发现。良渚文化历时千年之久，遗址群内仅有个别遗址发现有丰富的良渚早期文化堆积，而大量的各种类型、等级较高的遗址则属于良渚文化中期前后，它们是这一兴盛时期的突出代表。到良渚晚期，遗址的数量和规格大不如前，遗址群呈现出明显的衰落趋势。由于经过系统发掘的遗址不多，许多遗址及其之间的具体年代关系尚不明确，现有资料恐怕还不能完全展示遗址群的兴衰过程。关于良渚遗址群的“突然兴起”是与大量新迁入的人群直接有关的推论很值得重视，但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的证实。另外，对于归入良渚文化中期阶段的大量遗址，应该进一步在各自分期、相互比较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其编年序列，为探讨遗址群内同期遗存的布局、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提供条件。

## 二、遗址群内诸遗址之间的空间关系

遗址群内已发掘的遗址以墓地为多，这些墓地按其规格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反山、瑶山、汇观山为最高等级，钵衣山、文家山次之，以下属于平民阶层。在各等级内部也存在着差异。目前对不同等级的墓地尤其是高等级墓地，分别与同时期的居址以及其他各类功能遗存的对应关系及其分布组合特点尚缺乏全面具体的了解。进一步加强野外考古、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深入认识遗址群的社会结构。

## 三、莫角山遗址的重要遗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莫角山遗址是良渚遗址群内最大的高台遗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 670 米、南北宽 450 米，总面积 30 余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 8 米。夯筑基址总面积不少于 3 万平方米，由沙层和泥层间隔筑成，在泥层面上布满密集而清晰的夯窝。夯筑基址被成排大型柱坑打破，证明其上曾有过相应的地面木构建筑。进一步了解建筑遗迹的单体结构和整体布局，将成为确认建筑功能乃至整个遗址性质的关键所在。遗址东部的大片红烧土遗迹以及矗立于中偏北部的三座大土台的性质也有待于进一步确认，其结果或许能为认识莫角山遗址的功能性分区提供最新的证据。此外，一些打破了夯筑基址遗迹如多条沟（埂）遗迹、积石坑、埋填纯净土的不规则形灰坑等，究竟是与基址直接有关的设施还是基址废弃后良渚人从事其他工程的遗留，也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 登封八方王城岗遗址的聚落形态考察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一、八方王城岗遗址考古工作概况

河南登封八方王城岗遗址发现于 1951 年。1959 年,徐旭生先生对告成八方间遗址作“夏墟”调查。1975—1981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探索夏文化在告成镇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96 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建立该遗址的系列碳十四年代。2002 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在遗址展开考古工作。上述考古工作,为八方王城岗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条件:第一,在遗址发掘面积达 8000 余平方米,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年代学的研究;第二,为遗址中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建立了系列的碳十四数据,为深入研究提供可能。

## 二、八方王城岗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

聚落形态研究中包括对基本遗存的整理、遗存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考察、遗存与其他资料的关系等。现就这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 (一) 八方王城岗遗址中诸遗存的整理

遗存中主要遗存有:裴李岗文化遗存,在王城岗少见;仰韶文化遗存,分布于八方村东南地;龙山文化遗存,分布于遗址的东北部,遗存丰富可分五期,其中二期发现东西并列城址 1 座(西城中有夯土基址 10 多处,奠基坑 13 座),四期发现青铜器残片和文字;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与龙山文化遗存相似,遗存较丰富可分四期;二里岗文化遗存,分布与二里头文化遗存相似,遗存可分为二期;殷墟文化遗存,分布于王城岗一带;西周文化遗存,在王城岗有发现;春秋文化遗存在遗址中皆可看到,遗存较丰富可分二期。

### (二) 八方王城岗遗址中诸遗存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讨论

遗址中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仅几百平方米,当时的遗址为小聚落。仰韶文化遗存的面积 2 万平方米,此遗址仍为小聚落。龙山文化遗存的面积有 30—40 万平方米,在一期时,该遗址还是普通聚落;在二期和三期时,由于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的出现、使用和废弃,使之成为当时的重要聚落,该遗址的使用已处于夏代建国前后,即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的夏代始年公元前 2070 年。我们于 2002 年在遗址又发现一座面积 30 万平方米的左右的大城,其年代下限不晚于二里岗时期,上限年代有待探寻。值得注意的是新见大城与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小城有某种联系,我们期待在以后工作中有新发现。在四期和五期,遗址又降为普通聚落。遗址中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与龙山文化大体相似,当时仍为普通聚落。遗存的商代遗存中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遗存较一般,其时为一般聚落。西周文化遗存在遗址中罕见。当时亦为小聚落。春秋文化遗存的面积有 40—50 万平方米,其时为较大聚落。八方王城岗遗址前后延续几千年,在文明演进的不同时期,其性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其最辉煌时当推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时期,由史前时期的普通聚落发展为夏代建国前后的重要城址,到二里头、二里岗、殷墟、西周等文化时期又回归为普通聚落。该遗址是聚落形态研究中的

共时性和历时性考察的难得的典型个案。

### （三）八方王城岗遗址与其它资料的讨论

1、遗址的地理环境：八方王城岗遗址位于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这里是颍河流经的低平谷地，遗址东临五渡河，南望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且西眺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2、告成镇、东周阳城与文献：告成镇在春秋时期属郑国，战国时属韩国，先后为郑韩两国西部的重要军事重镇之一，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约 130 万平方米）即是当时的遗存。文献中的禹居“或”都阳城，表明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关于阳城的地望，依据文献阳城当距嵩山不远，大体应在嵩山和箕山之间的颍水河畔。

## 三、小结

### （一）八方王城岗遗址研究的学术意义

1、该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的意义：在聚落形态研究中，诸考古学遗存就是我们赖以进行聚落形态研究的基元。关于遗存的共时性，此遗址中诸遗存的细致分期为讨论其共时性提供了条件。遗存的历时性考察，为研究遗存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可能。遗存与其它资料的关系的讨论，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解释遗存提供机会。因此，该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2、此遗址对历史上夏文化研究的意义：八方王城岗遗址的发现、考古调查和发掘已有 50 年了，可以说是我国考古学界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的考古工作的一个缩影。在豫西和晋南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夏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不少共识和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在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 2070—公元前 1600 年等。在这个考古发掘研究的过程中，对八方王城岗遗址的研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 （二）八方王城岗考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1、新见大城的年代上限尚未明确；
- 2、新见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如何；
- 3、新见大城内的布局尚不清楚；
- 4、八方王城岗遗址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如何等。

# 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过程

德留大辅

([日]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学府)

我在这里谈论的是关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形成过程问题。王湾三期文化是初期王朝二里头文化形成的基础，也是二里岗文化陶器样式(style)的基础。

本文首次对郑州地区的陶器进行编年，提出河南地区其它遗址的年代，并对各时期的炊器形态和炊器组合(asmemblages)进行一系列分析，尝试作一些分区性的研究。

我将研究的结果综述如下：

首先，以王湾三期文化陶器样式的地理分布为基础，笔者找到了河南中部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庙底沟文化精制陶器(the finely made pottery)的分布和扩展范围与王湾三期文化大致相同。王湾三期文化中，精制陶杯(豆，杯…etc)和粗制陶器(日常用的炊器…etc.; the coarsely made pottery)的型式和组合在各个地区均有一定范围的分布。这就是王湾三期文化陶器样式构造(stylistic composition)。

上述样式构造的成因，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即河南中部地区有开阔的周围环境-华北平原-比较容易受到周围的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影响。

另外，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河南地区的陶器样式构造商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原因之一就是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即晚期晚段的王湾三期文化，它周围地区的社会阶段比较复杂，信息交流也很密切，自然环境也不断变化。这样，河南中部地区就适应了周围地域里发生的这些变化。也就是说，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样式组合说明，河南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中段以后，精制陶器的同一形式共有地区的信息网的密度明显增大。

# 东北亚农耕的扩散与山东半岛

宫本一夫

(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院)

通过收集朝鲜半岛人工栽培谷物的出土资料，并将其与考古资料的分析进行对比，我们认为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化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亦即，以西海岸为中心的华北型杂穀农耕扩散的第一阶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山东半岛至汉江下游以南，稻米作为杂穀农耕的一部分传入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陶器样式以及共存的华北型农耕石器，柳叶形磨制石镞等作为文化的复合体，公元前 3500 年前后，谷子和黍子的华北型杂穀农耕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南海岸地区。另外，水稻栽培以华中为中心向周围地区扩散的同时，华北的杂穀农耕的部分地区开始了水稻栽培。

第二阶段，我们可以设想在这样的大趋势下，稻米在公元前 2500 年前后直接由山东半岛传播到了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汉江下游地区。

公元前 1500 年以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在旱地耕作的同时真正的水田稻作得到确立。这是朝鲜半岛农耕化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是朝鲜半岛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转变，即由栉目文陶器向无文陶器进行转变的时期。无文陶器的形成，辽东的农耕文化复合体对其产生了影响。辽东这一时期的农耕文化复合体是，无文陶器文化阶段开始出现的石刀，扁平单刃石斧，柱状单刃石斧，辽东型石斧等新的石器组合。这样的石器组合在辽东半岛的双砬子 1 期-双砬子 3 期文化中可以看到，是在与山东半岛进行的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文化的发源地在山东半岛，有关这一文化源的形成原因本文拟进行考古学方面的探讨。

朝鲜半岛农耕化的第三阶段，不仅仅是朝鲜半岛的问题，其文化谱系与日本列岛的弥生文化以及远东地区的团结文化等的成立相关联，明确其成因，也就是理解整个东北亚的文化转变期的成因。

# 淮河流域史前稻作农业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张居中<sup>1</sup> 尹若春<sup>1</sup> 杨玉璋<sup>1</sup> 王象坤<sup>2</sup> 孔昭宸<sup>3</sup>

(1.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 2. 中国农业大学 3.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该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已经基本确立,文化面貌已被世人所了解。但是,这一地区史前先民的基本生计形式的研究,只不过是近十余年的事情,其栽培对象和耕作方式的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深入。据近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可知,淮河作为亚热带与暖温带的气候分界线,只是距今两千年以来的事情。万年以来的全新世时期,这一分界线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而不断的南北摆动,先民们的栽培对象和耕作方式也必然会随之而发生变化,进而使考古学文化的面貌甚至考古学文化的主体都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从目前材料可知,在距今九千年前,黄淮地区就同时存在稻作农业与粟作农业两种耕作方式,其分界线大约在北纬 33° 与 34° 之间。在全新世大暖期期间,这一分界线进一步北移,但在几次降温事件中,又几度向南摆动,直到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才大体稳定在北纬 32° 左右淮河干流一线。探明该地区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变与人类生计形式的变化之关系,生计形式的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哪些影响,在考古学文化上有哪些反映,对中华文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起到哪些作用,对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启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在淮河上游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游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和下游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分别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丰富的稻作农业遗存,这为研究中国乃至亚洲稻作农业的起源、演化、传播及环境变迁等重要基础理论问题增加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同时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徽境内的淮河中游地区也同样存在较早的原始稻作农业遗存。鉴于此,在 2001 年 10 月我们对安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稍早阶段的定远侯家寨、蚌埠双墩、霍邱红墩寺等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采集了一批含稻壳印痕的红烧土块,对在红烧土块中发现的保存甚好、具有鉴定特征的稻壳印痕进行了形态学观察,并对观察结果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一、考古调查与观察结果

1. 双墩遗址 2. 侯家寨遗址 3. 红墩寺遗址

## 二、淮河中游地区史前稻作农业探讨

## 三、原始农业与中华文明形成进程关系的探讨

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传统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相互碰撞、交叉与融合的主战场,因之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淮河流域又是史前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两种耕作方式的交错分布带,两种耕作方式及其操作者在这一带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变化。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考古学诸文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耕作方式上也可反映出来。而耕作方式的不同则反映了经济形态和生存模式的差异,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形成又与其经济形态和生业形式密切相关。两种耕作方式的此消彼长与两大文化传统、三大部族集团的势力此消彼长密不可分,史前耕作方式的变更又与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变密切相关。研究其相互关系,总结其演变规律,对今后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可以认为,淮河流域是解谜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

\*本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号:30070463)

# 关于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磨盘”“磨棒”

加藤里美

(日本 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在考古遗物中，能够确定的食品加工工具，有粉碎食物的工具和用于蒸、煮等烹调工具等。本文就其中的磨盘、磨棒工具作一探讨。许多学者都曾经指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处于耕种旱田杂粮栽培的“初期耕作形态”和“比较发达的农业形态”的过渡时期。磨盘、磨棒等加工工具以及其它农耕工具的出土是其社会耕作形态的指针。可是，到目前为止，关于磨盘、磨棒与初期耕作的关联性及其意义，尚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作为加工食品工具的磨盘、磨棒，其与栽培及植物、农具，以及食品的加工方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在文化性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磨盘、磨棒，早在1939年江上波夫和水野清一（江上·水野1939）就已提出见解。随后有光（有光1953）、天野元之介（天野1979）、腾本强（腾本1983）等的研究。磨盘、磨棒研究大约开始于对裴李岗遗址墓葬出土的遗物和磁山遗址的灰坑以及“组合物”的研究，学者在注意各地农具的同时，社会形态也被许多学者所关注（安志敏1979、李友谋1979，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学会1988，马1984，宋兆麟1986，金家广1995）。陈文在“讨论中国石磨盘”一文中初次对磨盘、磨棒进行了专论（陈1990）。可是，到现代为止在石磨盘、磨棒的分类和耕作发源的关联性，出土地点的差异，出土量，石器组成中它们所占比例等问题上，都缺乏确证性，尚有许多可商榷之处。在前人的研究上，笔者以307个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磨盘731件，磨棒932件）为研究对象，归纳出磨盘、磨棒类的定义、分布、时期、形态分类以及关于磨盘系统编辑年图。从大体上看，磨盘、磨棒在新石器时代有2个大分布：第1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分布，第2分布在从东北东部到辽东半岛范围之内。这两个分布在时期上有着偏差。进而，从地域上看磨盘、磨棒特征也有所不同。这说明磨盘、磨棒不仅仅是单纯的工具，而且具有祭祀和礼仪的性质。这个笔者称之为“有脚磨盘，磨棒文化圈”（加藤2002）。这些成果明确显示了按地域区分它们特征的必要性。在海岱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实例。

通过对海岱地区与磁山和裴李岗文化的磨盘、磨棒形态的比较可知，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海岱地区出土的磨盘与黄河中游流域出土的磨盘，不仅在形态而且在数量上也有很大不同。具体来说，海岱地区，后李文化期的磨盘很少，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其磨盘增多，从特征性很强的有脚磨盘的存在时期看，海岱地区与黄河中游流域有着时间的滞差。并且，磨盘比磨棒更能体现地域性特征。可是，也有一些跟黄河中游流域和东北地区相同的特征。由此可知，海岱地区的构成状况是很复杂的。

江上波夫·水野诚一 1939 《内蒙古·长城地带》 东亚考古学会

有光教一 1953 《朝鲜石器時代のすりちす》，《史林》京都大学 35・4

天野元之助 1953 《中国の〈ちす〉の歴史》《自然と文化》3

1979 《中国农业史研究 增补版》お茶の水书房

- 腾本强 1983 《石皿・磨石・石臼・石杵・磨臼（1）-序论・旧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 《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纪要》2号
- 加藤里美 2002a 《中国新石器时代における食品加工具の考古学的研究》国学院大学大学院丛书9  
2002b 《中国新石器时代における〈すりろす〉—研究の現状と方向性—》《亚州学志》创刊号
- 安志敏 1979 《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及发展》《考古》1979年4期  
1979 《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5期  
1998 《中国史前农业》 《考古学报》1998年4期
- 金家广 1995 《磁山晚期“组合物”遗迹初探》 《考古》1995年3期
- 宋兆麟 1986 《我国的原始农具》 《农业考古》1986年1期  
1997 《史前食物的加工技术-论磨具与杵臼的起源》《农业考古》1997年3期
- 陈文华 1990 《论中国石磨盘》 《农业考古》1990年2期



## 两城镇遗址水稻植硅体初步研究\*

靳桂云<sup>1</sup> 栾丰实<sup>2</sup> 于海广<sup>2</sup> 方辉<sup>2</sup> 蔡凤书<sup>2</sup> 文德安<sup>3</sup>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山东大学考古系 3、芝加哥自然博物馆)

在中美合作“中国东部日照地区考古研究”项目中，我们在两城镇遗址进行了植硅体分析，目的是通过微体植物考古学的手段，分析两城镇遗址的农业状况。

植硅体的提取和分析按王永吉等的方法<sup>1</sup>分析的初步结果表明，在样品中保存了大量的稻属植硅体化石<sup>2</sup>和大量的起源于禾本科其它植物（有竹子和芦苇等）以及部分木本植物的植硅体等。

根据植硅体的形态特征进行判断，两城镇遗址中出土的稻类植硅体属于栽培稻。野生稻和栽培稻属于稻属内的不同种，在没有野生稻生长地区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水稻遗存研究时，只要确定了稻属植硅体的形态特征，就可以判断为栽培稻。在日本的稻作农业研究就遵循了这种思路<sup>3</sup>。根据野生稻资源调查结果、稻作农业发展历史、考古发现的稻作遗存等证据，可以推论，龙山时代的海岱地区不属于野生稻生长区<sup>4</sup>，海岱地区龙山时代遗址中的稻属遗存属于栽培稻。

根据对部分水稻植硅体样本的形态测定，绝大多数样本的形态系数小于 1，表明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居民以种植粳稻为主。这次分析的部分样品中，水稻植硅体的含量比较高，这可能表明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了大量的水稻遗存，也可能说明采样位置靠近或者就是古代稻作农业活动区域。有些集中出土水稻植硅体的灰坑可能是稻谷加工或贮藏的场所。植硅体的分析发现的稻作农业的发展状况与制陶业、玉器等遗存所反映的两城镇遗址古文化发展的高水平正相对应。大植物化石分析的结果不仅发现了水稻还发现了谷子和小麦的遗存<sup>5</sup>。近些年来，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水稻和谷子的炭化植物遗存<sup>6</sup>和植物印痕<sup>7</sup>，表明水稻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大汶口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可能是海岱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鼎盛阶段。

从前述龙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发展规模来看，当时的环境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对两城镇遗址 20 个样品的植硅体统计也发现，在部分样品中发现了芦苇和竹子的植硅体；在多数样品中都含有反映温暖气候的长方型、方型、哑铃型、扇型、多铃型、平滑棒型植硅体，表明当时两城镇地区的气候属于相对温暖湿润类型。海岱地区史前稻作农业遗存分布范围最广的龙山文化阶段，正值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发生<sup>8</sup>，这可能说明当时的低温气候并没有达到抑制农业特别是稻作发展的程度。由于环境变化的全球性（global）与区域性（regional）、局域性（local）的区别，关于两城镇遗址稻作农业与环境的关系，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

\* 该项研究是“中美合作山东东南部日照地区考古研究”项目中植物考古研究的一部分。

致谢:

我们感谢美国 Henry Luce 基金会 (1999; award to Underhill, Feinman, von Falkenhausen) 和 National Science 基金会 (2000-2001, award BCS-99-11128 to Underhill and Feinman) 的资助, 使得我们的采样和分析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项工作的实验室分析和论文写作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吴乃琴博士和吕厚远博士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 1 王永吉, 吕厚远:《植物硅酸体研究及应用》, 海洋出版社, 1993年, 北京。
- 2 王永吉, 吕厚远:《植物硅酸体研究及应用》, 海洋出版社, 1993年, 北京; 吕厚远, 吴乃琴, 王永吉:《水稻扇型植硅体的鉴定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6年第4期, 82-86。
- 3 Fujiwara, H. R. Jones and S. Brockwell, Plant opal (phytoliths) in Kakadu Archaeological sites: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R. Jones (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kadu National Park, National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s Special Publication 13, NPWS Canberra*. 1985.
- 4 靳桂云:《中国北方史前考古遗址稻作遗存的植硅体判别标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第14卷第1期, 1-9。
- 5 赵志军等:《山东两城镇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植物遗存初步研究》,《考古》待刊。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尧王城遗址第二层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3日; 靳桂云, 吕厚远, 魏成敏:《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硅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82-87; 孔昭宸, 刘长江, 何德亮:《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59-62; 王增林:《植硅体分析在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中的应用》,《考古》1995年第1期, 88-90; 王增林, 吴家安:《尉迟寺遗址植硅体分析》,《考古》1998年第4期, 87-93。
- 7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 载: 北京大学考古系、烟台市博物馆编著:《胶东考古》,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0年。
- 8 靳桂云, 刘东生:《中国北方地区中全新世环境演化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科学通报》2001年第147卷第5期, 408-413。

# 地质考古学研究与复杂社会观念： 青海省个案研究

王睦 地质考古学与土地利用研究小组成员  
(德国考古研究所欧亚考古部)

德国考古研究所欧亚考古部主要从事西伯利亚大草原一带人类空间和土地使用历史的研究(例如伊拉克、黑海沿岸、哈萨克斯坦)2002年地质考古学与土地利用研究工作组成立,成员主要来自德国考古研究所、农业地形和土地利用研究中心、波茨坦大学生态地理学研究所。坐落于中国西北部的青海省,地处欧亚大草原的东南边缘,被选为这次联合研究关键地区之一,用来评价人为因素和气候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我们在此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合作伙伴表示诚挚的感谢。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西北边缘,地理位置在北纬 $32^{\circ}$ 到 $39^{\circ}$ ,东经 $90^{\circ}$ 到 $103^{\circ}$ 。这一地区的地形学与水文学均相当复杂。当前的气候属次潮湿向半干旱过渡地带,年降水量在250—600毫米,水资源严重不足。降水时间主要集中于7月份到9月份,与太平洋季风有关。一次突发暴雨的降雨量就有可能超过年降水量的40%。这种气候环境,加上对当地广泛分布的黄土沉积的过度开垦使用,导致这一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

北中国的历史和古环境资料表明,自从中全新世以来,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气候变化,均是影响聚落形态的主要因素。社会复杂程度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强度而言,对于经济资源的依赖都相当严重。2002年,我们的研究目标主要集中于如下两个主题:1、喇家遗址附近官厅盆地的地形变迁(齐家文化);2、北中国的树轮研究与气候重建。

(1)青铜时代早期的喇家聚落以倒塌的房屋内发现相当数量的人体遗骸而闻名于世(王2002)。死者显然是一场突发的自然灾害,灾害发生的如此迅速,以至于当时的居民无法逃生,即便有个别幸存者,也无暇正常安葬遇难者。对于这次灾难事件的性质,考古学家和地质生态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地震,黄河洪水、泥石流。考察结果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官厅盆地社会复杂化的研究提出新的基础数据。

(2)本文将介绍青海省都兰县树木年代学和年轮气候学的研究成果。从公元7—8世纪吐蕃王国墓葬出土的大量树木主干在1999年作了取样分析。我们基于刺柏式丛木的年代学跨越了1315年间,即把已经发表的都兰年代学从公元800年一直向前延推至公元前515年。与现代最近的气象站所记录的普通月份温度和降水记录的环形宽度指数对比分析显示,年降水量(以前是7月,现在是6月)是控制这一地区树木生长的一项重要因素。

重新建立的降水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现代都兰所记录的数据相似。然而,相对干燥的年份所占的比例比现在更多一些。公元前324—300、249—150、74—50年,公元后51—350年和426—475年均经历了相对干燥的气候环境,平均降水量在140—171毫米。有利的潮湿的气候出现在公元前416—375、349—325、299—275、124—75年,公元后376—425、501—525、576—675和726年以

后。相对湿润的气候的标志是平均降水量在 196—243 毫米。公元 1 世纪降水严重不足可能是中国汉代农民大举撤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与之伴随的是大批非中国动物种群大肆东迁。公元 576—675 年间，与大唐帝国比邻而居强大的吐蕃王国，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相对湿润的气候环境。

都兰盆地和丰台谷地是青海省不同类型地形的典型，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与古气候环境的研究，是第一次对地理生态系统进行尝试性阐释，其中包括人类社会复杂化进程。这一项目同时提供了重建新石器时代地形发展模式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研究成果与关于当地近年来发展的有计划的调查数据和相关文件（比如资源再分配、人口动力学）相结合，为规划未来地形发展和土地利用战略模式奠定了基础。

#### 参考文献：

HOFFMANN 2003: Hoffmann, C., *Spätholozäne Landschaftsentwicklung am Oberlauf des Gelben Flusses*. Diploma Paper, Potsdam University.

水 2002: 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1。

TARASOV, HEUSSNER, WANG et al. 2003: P.E. Tarasov, K.-U. Heussner, H. Österle. S.Z. Wang, 王睦,《由树木年轮数据所显示的公元前 515 年—公元 800 年都兰降水变化与北中国地区人类居住环境的关系》(待刊)

王 2002: 王明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 2000 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 年第 12 期, 12—28。

# 中国古代早期制盐业的初步研究

朱继平<sup>1</sup> 孙智彬<sup>2</sup> 燕生东<sup>3</sup> 秦颖<sup>1</sup>

常叙政<sup>3</sup> 佟佩华<sup>3</sup> 王昌燧<sup>1</sup>

(<sup>1</sup>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联合重点实验室  
<sup>2</sup>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sup>3</sup>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盐的开发利用与人类早期聚落的形成密切相关。据说，人类最初在盐渍地上搜集盐霜来获取盐分，以后逐渐懂得了泉盐和池盐的利用，并在盐区周围聚集生活。传说中，上古文化最先形成的地方，常常在自然产盐之地或用盐便利之区，这方面最著名的有河东盐区和巴东盐区。河东盐区位于山西南部涑水小河谷一个狭小的地区，据说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邻近于此，这与那里盛产池盐似乎有着内在的联系。巴东巫山盐泉是大西南地区人类开发盐泉最早的地区，尽管这里土地贫瘠、不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因拥有食盐，使之依然成为古代文明的发达地区。

井盐开发涉及人类寻找盐矿、挖井开采、炼制食盐、储存运输等全过程。晋代《华阳国志》记载的战国末期李冰开广都盐井(约公元前 255 年)的史实，应是我国最早开凿盐井的记录。然而，通常在史料记载以前，盐业开发早已进行。显然，关于早期盐业起源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只能依赖于考古发掘和科技手段。遗憾的是，盐遇水即溶解流失，甚至吸收水汽也能化解消失，故人们难以获得可供测试分析的食盐遗物。这样，用科技手段对古代盐业的研究，至今仍处于探索阶段。

不难理解，井盐的开凿和煎煮，一般都会留下盐井和与制盐相关的残存物，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可望发现这些盐井和制作或储存食盐的容器。近些年来，三峡库区古代遗存的抢救性发掘，为该地区的古代盐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如何通过上述残存物的分析，从自然科学角度，为判断其与制盐相关提供证据，因有相当难度，至今未见报导。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次深入的探讨。选择长江三峡库区忠县中坝遗址与井盐开发相关的样品——花边陶釜，通过 XRD、SEM 和液相包裹体的测试分析研究，证实了考古学家的推测——我国古代井盐的开发和利用至少可上溯至西周时期。中坝遗址花边陶釜内壁沉积物和早期制盐遗址及现代盐厂的沉积物具有基本相同的物相，表明花边陶釜在当时很可能是制盐工具。SEM 分析表明陶釜由内表面至陶胎内部 Na、Cl 元素成分含量呈减少趋势，存在明显的盐度梯度，而其外表面盐度为零。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推断这种花边陶釜应为当时的煮盐工具。陶釜内壁沉积物的包裹体分析表明其形成温度较低，代表着当时煮盐的溶液温度。因目前无法测定其盐度，故尚难以提供过多的有关当时煮盐的工艺信息。

# 青铜器重熔对铅同位素比值的影响

李清临 秦颖 朱君孝 王昌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联合重点实验室)

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法研究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向。然而多年来这一研究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如今看来,除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外,铅同位素在青铜器冶铸过程中发生明显分馏,应为这一研究受阻的主要原因。在这一认识下,我们前期曾依据仿古工艺做了青铜器范铸模拟实验,并测定了所冶铸的青铜样品的铅同位素比值。实验显示,青铜在冶铸过程中,铅同位素确实存在分馏现象,而且这种物理分馏的强度与熔融状态下合金的温度和时间呈正相关,多次不断的重熔将导致分馏的累积,从而可能使分馏达到一个较大的幅度。在得到这一结果后,本文即重新审核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进一步揭示青铜器重熔和热处理对铅同位素比值的影响,以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星堆青铜器的样品数量和器型都较多,年代又相近,以这一遗址进行分析是十分适宜的。将所有样品分为两个大类:实用器物和礼(神)器,实用器包括戈、盘、尊、罍等器型,礼(神)器则有神树、面具、铜瑗、立人像、头像、龙虎尊、方彝、三角形器、车轮形器等器型。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做铅同位素比值的散点图及计算各项数理统计值。

分析结果显示:1)礼(神)器物的铅同位素比值,集中于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实用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的分布范围则显著大于礼(神)器的;2)相对于礼(神)器物而言,实用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沿同一方向增大;3)所有数据皆接近连续分布,无明显跳跃趋势;4)两个器类铅同位素比值的分布模式与各自的样品数量基本无关;5)两类器物的中位数相差无几,而实用器物铅同位素比值的平均值、方差和标准偏差,皆明显大于礼(神)器物;6)礼(神)器物的铅同位素比值范围的狭小,喻示其矿料(主要是铅矿料)具有相同来源。至于实用器物,尽管其铅同位素比值的变化范围较大,但因与礼(神)器物出土于相同遗址,具有相近的时代,且其铅同位素比值沿同一方向增大,又非跳跃式分布,理应与礼(神)器物具有相同的矿料来源,即相同的铅矿料来源。既然如此,其铅同位素比值平均值、方差和标准偏差的偏大,只能缘自重熔和热处理。

# 2003 年长清月庄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月庄遗址位于山东省长清区归德镇月庄村东，海拔 50.5 米。西距黄河约 8 公里，向东北 10 公里为长清区政府。南大沙河从东南向西北环绕遗址流过。

遗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济南市文物处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2000 年春济南市考古所进行过一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 30 平方米左右。2003 年 3 月—6 月，为配合山东大学考古系 2000 级本科生教学实习，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对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此次发掘共开探方 26 个，发掘面积近 800 平方米。

## 一、发掘经过及方法

为了解月庄周围遗址的分布情况，我们首先对南大沙河流域进行了区域的系统调查。在 10 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调查早期遗址 1 处，晚期遗址 20 余处，陶片分布点多处。经过调查初步了解了南大沙河两岸遗址的分布情况。在发掘前，还对月庄遗址进行了系统的钻探，初步探明了遗址的范围及地层堆积情况。从钻探结果来看，原来认为的月庄、张官两个遗址，现在由于陶片分布具有连续性以及地层情况清楚，所以可将其合称为一个遗址。参照钻探的情况，我们选择在遗址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分别进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采用 context 的发掘方法，对硅酸体、测年、动物以及植物等标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采样。

## 二、主要收获

月庄遗址地层可分 12 层，其中①层为现代耕土层，②—⑤层为晚期文化层，⑥层为一层亚粘土，未出土任何遗物，⑦—12 层为早期文化层。下面按早晚两期分别予以介绍。

### （一）早期文化遗存

#### 1、遗迹

同晚期文化遗迹类似，早期遗迹也以灰坑为主，有少量灰沟和墓葬。

灰坑形状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之分。以圆形居多，椭圆形次之，不规则形很少。坑壁有直壁和斜壁两种。坑底为圜底或平底。灰坑内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种类有鱼、鹿、鸟、牛等。部分灰坑内出有完整的食肉动物骨骼。

灰沟形状略呈长方形、斜壁、平底。出土器物很少。

墓葬仅一座，破坏严重。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墓，无葬具。没有随葬品。

#### 2、遗物

遗物种类有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

陶器颜色以红褐陶为主，红陶次之，另有少量的黄褐陶、黑褐陶和青灰陶。夹砂陶占绝大多数，仅在地层中发现泥质陶 10 余片。器表以素面为主，部分陶器表面装饰有附加堆纹、刻划纹、压印纹和乳钉等。陶器全部为手制，部分器物表面有刮抹痕迹。器形有釜、钵、碗、罐、网坠等。

石器数量较多。石器原料以砂岩为主，另有少量石英岩和花岗岩等。器形有磨盘、磨棒、斧、镑、石球等。其中磨盘、磨棒数量占绝大多数。磨盘包括有足和无足两大类。磨棒形制较多，从横断面来看，有圆形、椭圆形、梯形、圆角长方形、近三角形之分。石斧形状近梯形，刃部磨制精良。石器的制作方法多为先琢后磨。有一些石器损坏后，经过加工重新使用，如有的磨棒经磨制后用作研磨器。

骨器多磨制精良。器形有锥、镞、鏃等。锥的数量最多，有扁圆形和圆形两种。鏃有带倒钩和不带倒钩之分，其中倒钩的数量不一。

角器为鹿角经磨制而成。器形主要是锥，刃部磨光。

## （二）晚期文化遗存

### 1、遗迹

绝大多数遗迹是灰坑，另有少数灰沟和墓葬。

灰坑形状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几类。以圆形居多，椭圆形次之，不规则形甚少。圆形、椭圆形灰坑中，形制规整的占一定数量。一般作直壁、平底或口小底大的袋形。部分灰坑底部和坑壁经过烧烤。另有个别灰坑中出有完整的人骨架。

灰沟形状不甚规整，斜壁、平底。

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葬具。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

### 2、遗物

遗物种类有陶器、石器、铜器等。

陶器颜色以灰陶为主，褐陶次之，另有少量的红陶、黑陶、黄褐陶等。陶质有夹砂和泥质之分，泥质陶数量较多。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的弦纹。部分陶器上有文字和刻画符号。器形有盆、豆、罐、盂等。

石器数量很少，只见磨石和斧的残器。铜器只有2件，一件为镞，另一件为削。

## 三、学术意义

### 1、文化谱系的建立

月庄遗址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存从陶器形制来看，与以往发掘的后李文化早期陶器形制接近。如月庄遗址陶器也以圜底器为主，器形基本组合为釜、钵，不见三足器。但是，月庄遗址的陶器叠层的较少，陶质较好，并出现了一些与北辛早期文化类似的陶器。因此，从陶器演化来看月庄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年代应介于后李文化早期和北辛文化早期之间，有望弥补文化谱系上的一段空白。

### 2、古环境的复原

在月庄遗址发掘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土壤标本。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有望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复原月庄遗址早期居民生活的古环境。同时，对于第⑥层亚粘土层土壤的分析，可以为我们了解古代遗址的形成过程提供重要的环境资料。

### 3、农业起源的研究

通过对植物硅酸体的分析，可以获得月庄遗址植物遗存的基本资料。结合石器以及陶器的具体研究，能够了解月庄遗址早期先民的食物来源和植物种植情况，从而为探讨北方农业起源问题提供新的资料。

（王建华）



## 2003 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2003 年春，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济南大辛庄遗址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区位于遗址的东南部，共开 4×4 平方米探方 39 个，发掘面积 600 余平方米。共揭露出属于商代中晚期的房址 10 座、窖穴（灰坑）近 300 个、墓葬 30 余座，出土包括陶、瓷、骨、角、蚌、玉、石、铜和金等各类质料的文物一千余件，收集各类自然遗物（动物骨骼、植物遗存和土壤标本等）三千余件。

此次发掘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商代甲骨文。共发现 4 片刻字卜甲，其中最大的一片编号为 T2302⑤B: 1，龟腹甲，由 4 块甲片缀合而成。保存了右甲桥、前右甲、后右甲、尾右甲和尾左甲以及前左甲、后左甲的大部分。残长 18、残宽 20.5 厘米。龟甲在使用前经过精细的整治处理，刮削痕迹明显，厚薄均匀，正反两面均较光滑。右甲桥中部偏下的位置有一小穿孔，尾左甲近边缘处有一半圆形穿孔。钻、凿、灼具备。钻、凿排列规整。有刻辞。

刻辞内容为卜辞，分布于前左右甲和后左右甲。其中后左右甲局部漫漶不清。可识别的刻辞共 33 字。分区隶定如次：

前左甲：

不徙，允徙。□酉，温。

前右甲：

不[徙]，允[徙]。

弗温。

后左甲：

□ □[不徙]，允[徙]。

四，御母彘 豕豕。母一。

后右甲：

不徙，允徙。

弗御。御。 。

占卜内容为“徙”、“温”和“御”，徙或可理解为出行，温和御则是两种祭祀。其中御祭的对象为“四母”，用了四头猪，即彘（野猪）、（阉猪）和两头家猪。

大辛庄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系统，但在行款和个别文字的写法上又有自身特点。这是在殷墟之外第一次出土的商代卜辞，是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重大发现。

商代墓葬是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之一。墓葬集中分布于三处，分别组成独立的墓地。其中属于中商时期的墓地一处，已发掘墓葬 16 座。墓葬排列整齐，相互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墓葬的排列自东而西、自南而北，年代依次递减，时代约当中商文化中晚期。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主头西南，方向在 230 度左右。除了小型墓葬之外，多数墓葬发现有腰坑殉狗的现象，而且时代越晚殉狗之风越

普遍。少数墓葬留有生土二层台，个别墓葬还发现有头箱和脚箱。M106 是该墓地中时代较早、规格最高的一座。墓圻长 3.2 米、宽 2.2 米，深 2.17 米。填土经过夯打。葬具为一棺一椁。棺椁之间和椁室之外有 4 具殉人。该墓出土随葬品非常丰富，共发现包括青铜器和玉器在内的各类随葬品 40 余件，其中铜器 11 件，组合为觚、爵、斝、尊和卣等。玉器 19 件，器形有戈、钺、圭、璧戚、璜和柄形器等，另有海贝 6 枚。该墓葬规格之高、随葬器物种类之齐全，在我国东部地区中商时代的墓葬中是罕见的。其中的铜尊一对，器形硕大，制作精细，在我国东部地区属首次出土。玉戈、玉圭、玉钺和玉璧戚等所用玉料上乘，磨制精细，不亚于郑州商城的同类器物。从铜器组合、器形特征和纹饰分析，器物的年代与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同时，约当于中商文化中期。

晚商时代的墓地发现两处，已经发掘的墓葬共 11 座。这一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头向南，墓向多在 190 度左右，几乎都有腰坑殉狗的现象。“二层台”上殉狗的现象更为普遍，一般为 4 条，最多的达 20 条。个别墓葬也有殉人。随葬陶器组合一般为鬲、豆、簋，铜器组合则为觚、爵（或觚、爵、鼎）。以 M72 为例，该墓墓圻长 3 米，宽 1.2 米，墓向 195 度。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中，铜觚、爵、铜鼎和两件铜戈被置于棺内；陶器（鬲 1、豆 1、簋 1）则放置在头端椁外填土中。该墓殉狗 11 条，一条在腰坑内，其余在“二层台”之上。铜爵扳手之下铸有族徽文字“𠄎”，为以往所未见。从陶器和铜器形制分析，该墓时代相当于殷墟三期。如前报道，大辛庄甲骨文出土于⑤A 和⑤B 之间的活动面上，而这两个文化层被该墓所打破，因此可以肯定大辛庄甲骨文的年代不晚于殷墟三期。

房址可分为半地穴式和平地式两种，有的平地式建筑挖有宽 1.5、深 1.5 米的基槽，当属一大型建筑基址，基址的面积和形制尚有待进一步廓清。

窖穴和灰坑多为圆形，也有少量方形坑。H690 是一座直径 5.2、深约 3 米的大型圆形窖穴，穴壁光滑，底部铺设木地板，制作考究。废弃后的填土中包涵物丰富，即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鱼鳞等食剩的废弃物，也有制作骨角器的废料，同时还发现有等级较高的原始青瓷、金箔和卜骨等。能够复原或基本可以复原的陶器五十余件。陶器中以典型的商式器物为主，同时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属于大辛庄商文化“第二类遗存”的器形。前者主要是灰陶绳纹类器物，器形包括鬲、甗、假腹豆、簋、盆、澄滤器、圜底尊和大口尊等，器物组合和形制特征与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者相同。后者以素面褐陶类器物为主，实际上也包括两类陶器。一类为岳石文化晚期的常见器物，属典型的土著式陶器，器形有鼎、甗、大口罐和豆等；另一类是融合了商式和土著式二者因素而形成的器物群，器形有素面鬲、簋和深腹盆等。灰坑中有不少埋有完整的动物骨架，种类有猪、羊和牛等，当属祭祀坑。

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商文化墓地在海岱地区属于首次发现，像 M106 这样随葬品如此丰富的殉人墓，在我国东方地区也属罕见。M72 发现的族徽是该遗址首次发现的铜器铭文，该族徽不见于以往著录，对于判定晚商时期大辛庄墓地的性质提供了直接的文字资料。发掘中对土壤过筛，并对四百余个遗迹单位的土壤作了浮选，收集到包括动物、植物和土壤等在内的大量自然遗物标本，为研究当时的生态环境、食物结构和动植物遗存的文化含义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上述发现，将对甲骨学、商代考古和商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方辉）

##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本刊为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创办的不定期刊物，旨在反映近期国内外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主要刊载与此相关的发掘快讯、研究动态及相关论文摘要，以便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 一、征稿内容

本刊设置中心动态、学术研究、田野简讯、读书评论四个栏目。具体内容涉及考古学的理论探索、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聚落形态演化、古环境与气候变迁、人类生业模式以及文化交流互动等方面。

### 二、来稿要求

1、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单位、地址、邮编、电话、职称(职务)、研究方向。

2、论文、简报一般不超过 3 千字，书评 1 千字以内。请同时提交英文题目及 200 字左右的英文摘要。

3、来稿请附电子版，或直接用电子邮件投稿。

4、稿件一经发表，赠本刊一份以代薄酬。

### 三、通讯地址和咨询电话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250100

电话：0531—8366149/8565268

传真：0531—8565268

电子信箱：[arc@sdu.edu.cn](mailto:arc@sdu.edu.cn)

网址：[www.arc.sdu.edu.cn](http://www.arc.sdu.edu.cn)

**Newslet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Research**

**Volume 1, Dec. 2003**

**The Research center of Oriental Archaeology, Shandong University**

**27 Shanda Nanlu**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250100**

**Tel: 86-531—8366149/8565268**

**Fax: 86-531—8565268**

**Email: arc@sdu.edu.cn**